

光輝雙十的歷史——中華民國國慶日近 百年的歷史變貌（1912-2008）

周俊宇

摘 要

國慶日意指國家的誕生日，它是一個以建國初始歷史記憶為基礎的政治象徵，意在喚醒、凝聚國民的光榮感與向心力，亦向國內外展現傳統延續且發展永續的立國精神。建國已屆百年的中華民國，國名雖然依舊維持，但時至今日其政治體制、社會文化、國際地位，甚至在統治範圍及國民組成上都已歷經極大變遷。作為國家最高慶典的雙十國慶，在國家體質近百年來持續且時而劇烈的變化下，其制定到實施的過程，在形式內涵等層面上，亦反映出政治文化及歷史記憶的變貌，值得吾人作為一個國家歷史的縮影來觀察。

近年，美國及日本、中國學界從政治、社會文化史或是文獻考證的角度，主要探討了中華民國成立到遷臺以前，國慶日的制定、實施過程及其影響，本文將引述現有研究成果，佐以史料發現，概述中國大陸時期國慶日的歷史，更將焦點置至戰後臺灣的黨國威權時期，勾勒國民黨政權於外在國際環境及內在統治基礎皆有劇烈變動下，如何藉由國慶日場合繼續宣稱其統治正當性，而它在九〇年代後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臺灣社會中，又呈現何種變貌。

關鍵詞：國慶日、雙十節、黨國體制、歷史記憶、統治正當性

Historic Glory of the Double Ten Day: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OC's National Day (1912-2008)

Jyun-yu Jhou*

Abstract

Any and every National Day of a people or group of peoples is designed as historic symbol to engrave the founding of country, to awaken its people to the memories of its glorious past, to encourage the royalty to its nation, in addition to showing off this nation thus found has inherited the proud national tradition, and will make an endless development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nation has now reached its centennial anniversary. Even through the name has continuously been kept intact since its retreat to the Taiwan Islands, there have been witnessed many inevitable changes in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ulture internally, in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externally, as well as in its sovereignty and even the composition of peoples generally. A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emoration of the ROC., the Double Ten Day has too showed various changes during its century.

Recently, there are found some researches in the USA, Japan and the PRC focusing on the ROC's numerous Double Ten Days celebrated on Mainland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takeover, but there has not yet been shown much concern about the changes that had taken place after the evacuation of the ROC government to Taiwan since 1949. This official holiday had been an excellent and exclusive realm for KMT's assertion of its legitimacy on the One-China policy until 1990's, when considerable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wake or as a result of the

*Ph. D.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Area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democrat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aiwan. This article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various transitions relating to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Double Ten Day, as found in the findings of recent research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 National Day, Double Ten Day, party-state system, historical memories, legitimacy

光輝雙十的歷史——中華民國國慶日 近百年的歷史變貌（1912-2008）^{*}

周俊宇^{**}

壹、前言

國慶是一國最重要之慶典，無論該國政治性節日多寡，紀念建國的節日皆為不可或缺。國慶是時間制度中有關國家誕生時刻的象徵刻畫，執政者藉此重溫過去、期許未來，對內要喚醒、強化國民的榮耀感和向心力，對外也要宣揚貢獻，主張自國的國際地位。一個歷史長久的國家，即使國名未變，其政治體制、外交處境、社會結構以及國民的集體記憶等國情必定應時而變。國慶作為執政者傾力展演的舞臺之一，觀察其歷年紀念活動形式、內涵的異同，也是瞭解國家整體政治文化及歷史記憶變貌的一個面向。

至於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慶日，究竟反映出何種基於自有歷史與時空背景的特殊性？首先，它的轉變不僅於時間，也在空間。其實，國慶日中所見的象徵、儀式及論述等等應時而變，在世界各國本非罕見之事。然而，一百年來中華民國曾歷經了——從中國大陸到臺灣，——這樣一個統治範圍的巨大變動。對照今昔的國慶論述，即使基本的歷史框架仍在，但統治者在文告中的所願所念，在社會參與中可見的國家認同等形貌皆已大異於前。其次，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本文根據筆者碩士論文部分內容改寫而成，研究期間承蒙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紀念石田浩教授臺灣研究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獎助制度、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臺灣研究獎提供獎助，特此誌謝。參考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7月）。

收稿日期：2011年4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6月22日。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就讀於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綜合文化學院區域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由於國家長時間被置於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下，在政權蓄意經營之下，節日關聯的歷史詮釋長久以來遭到獨占，在民主化的今日仍留下痕跡。

關於國慶的相關研究，在美國、日本和中國已有相當成果累積，這些研究基本上已經詳細地釐清民初國慶的制定過程，也對當時的政治文化及大眾心態轉換有所討論。¹ 不過，這些研究的主要關心，還是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及政治符號等課題上，故將時間斷限放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在臺灣，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遷臺時期，且大多是按政權或年代分期來分析裝飾設計、活動或閱兵等形式改變及其意涵，對時代背景下的整體形塑少有全面性討論。² 由此可見，就這個課題而言，有關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慶在黨國體制下的質變，乃至於戰後撤退來臺至今一百年的延續或變遷過程，尚餘討論空間。以下，本文探討近百年來國慶的變貌，在民國初年部分，將引述、整理現有研究成果，敘述國慶制定過程，至於重點則放在國府北伐統一以後，特別是戰後中央政府遷臺兩蔣執政期間對國慶日的高度運用，最後則論及九〇年代以來至民主進步黨政權首次執政期間，國慶日意象所呈現的崩解情形。

首先，本文欲針對目前國慶的定義作討論。留意時下媒體的敘事，可以

¹ 這些研究，包括姜瑞學，〈北洋政府與中華民國國民塑造——以「雙十節」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3 期，頁 216-241；李學智，〈政治節日與節日政治——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國慶活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頁 63-75；何卓恩、周游，〈「共和」與「革命」：民初「雙十節」詮釋之演變〉，《社會科學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155-160；小野寺史郎，〈民国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国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20 号（2005 年 6 月），頁 208-224；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 年 3 月）；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等。

² 石世華，〈雙十節總統府建築物裝飾涵意演變（1950-200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2008 年）；蘇芳湄，〈臺北總統府廣場雙十節活動形式意涵演變（1950-200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2008 年）；林柏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國慶閱兵的政治意義——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949-1964）〉，《史學彙刊》，第 23 期（2009 年 6 月），頁 193-224。

發現臺灣社會多將 10 月 10 日認知為「中華民國的生日」，而 1 月 1 日則是新年元旦。³ 在官方論述中亦可見此傾向，這點可以民進黨 2000 年執政後，陳水扁總統首次發表的開國紀念日和國慶日兩篇文告為例。2001 年 1 月 1 日〈九十年元旦祝詞〉稱：「今天是中華民國九十年元旦，也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天。當全世界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之際，個人要以最嚴肅和最堅定的態度，為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祈福。」⁴ 同年 10 月 10 日〈中樞慶祝中華民國九十年國慶典禮致詞〉中：「今天是中華民國九十歲的生日，也是新世紀的第一個雙十國慶。」⁵ 前者是以迎接新世紀到來的心情祝福新年元旦，而後者則明白指出國慶日等於國家生日。在兩篇文告開頭的簡短字句中，可以感受到官方認知的差異。

此一認識值得進一步討論。如果以國家正式的成立日為準，那麼民國是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就臨時大總統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而「開國」的，也就是說，將開國紀念日視作國家生日，似乎比較切合。雖然，當世界各國以「新年元旦」為名目放假時，我國官方法規上乃明文寫定該天是「開國紀念日」。然而，吾人在開國紀念日當日的元首論述、媒體報導上看到的，幾乎都單純將開國紀念日視作與世界各國無異的新年元旦。一直以來的元首文告亦大多訓勉國人檢討一年成敗得失，指示未來施政方針，與其他文告內容呼應節日意義有所不同。⁶ 九〇年代中後期開始流行，每年年終於各地舉辦的跨年晚會，目的也在與全球同步迎接新年。「開國」名目仍存，但已被淡化而偏重「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新年意涵。

有關其因，部分是由於民國成立日，也是新曆元旦之故。1912 年 1 月 1

³ 例如魏永齡，〈海內外同胞聯歡大會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中央日報》，民國 85 年 10 月 10 日，版 24；王平宇，〈熱情 歡樂 慶雙十〉，《自由時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版 3；周美惠等，〈世紀交替 凱達格蘭越夜越瘋狂〉，《聯合報》，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版 3。

⁴ 陳水扁，〈九十年元旦祝詞〉，收入行政院新聞局編，《陳總統水扁先生九十年言論選集（上）》（臺北：編者，民國 91 年 5 月），頁 3。

⁵ 陳水扁，〈中樞慶祝中華民國九十年國慶典禮致詞〉，收入行政院新聞局編，《陳總統水扁先生九十年言論選集（上）》，頁 3。

⁶ 紀慧君，〈我國元首論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三年元旦文告之語藝分析〉（臺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3 年 7 月），頁 35-36。

日，孫中山宣誓就臨時大總統職，1月2日發布通電，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為民國元年元旦，⁷在標示共和國成立的同時，也與世界時序接軌，邁入新時代。同年，曾經參與革命的吳敬恆在《民立報》為文建議將每年1月1日命名為「建始節」，一以標明民國之始、二以標明改建陽曆之始、三以標明改建每年月日之始。⁸「建始」在這裡不僅是意味建國與改曆，同時也代表新年之始。中華民國的1月1日自始即具有多重意義，如今「開國」的這個面向則顯有流失。

從另一角度來看，儘管10月10日並非民國成立日，但仍可說它是新國家的誕生日。一般認為民國的成立直接肇因於1911年10月10日（舊曆8月19日）的武昌起義，所以紀念革命發生的10月10日，就像法國紀念7月14日，美國紀念7月4日般，是選擇革命或獨立的歷史性時刻作為國慶。這也是民初所以將辛亥革命制定為國慶日之因。吾人可稱，開國紀念日和國慶日本屬性質相近的節日，不過，歷史發展下卻使得後者超越前者，更具有其象徵意義。

貳、中國大陸時期國慶日的制定與黨化

一、民國成立初年國慶日的制定過程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甫成立的中華民國由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全國教育官員與專家舉辦臨時教育會議，討論新教育制度基本框架，由於學校行事曆制度的需要，在「學校學年學期及休業規定」草案的討論中，也觸及新國家紀念日問題。會中主要意見，如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邵章認為「紀念日當以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之日為紀念日，因其係關係於全國觀念之一日」，

⁷ 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改曆改元通電〉，收入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8年11月），頁25-26。

⁸ 吳稚暉，〈答客問革命紀念日應有之盛況〉，《民立報》，新紀元（1912年）9月22日，頁12。

強調南北議和民國統一的象徵意義。而江蘇省教育司司長黃炎培則指出紀念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重要性表示，「立國紀念最為重要，南北尚未統一時，南京已有政府，約法已經頒布，總統已經推舉，參議院亦已成立，所以這次北京政府的成立實是奠於南京。」會議最終通過黃氏所提意見，「以陰曆 8 月 19 日為革命紀念日、陰曆 12 月 25 日為南北統一紀念日、以陽曆 1 月 1 日為立國紀念日。」向參議院提議。⁹ 此一階段，陰曆 8 月 19 日辛亥革命紀念相對於其他紀念日的重要性尚未被特別凸顯，會中決議更以立國紀念為最重要。

當武昌起義時屆週年，在以烈士追悼為中心的活動企劃中，此一事件作為民國成立起點的重要性被強調，這個認識又參照美國和法國的獨立、革命紀念日而更形強化，最終使得烈士追悼與建國祝典相以結合。¹⁰

1912 年 9 月 9 日，副總統黎元洪呈請大總統及各機關，表示將於陽曆 10 月 10 日在武昌召開週年紀念大會，邀請各單位共襄盛舉，追悼陣亡義士。¹¹ 參議員谷鍾秀認為武昌起義是全國紀念日，絕非武昌一地的紀念，建議各省應該開會追悼，由政府統一儀式。¹² 如此呼籲與通電下，各省都有舉行儀式的計畫，它們的共通點在追悼武昌起義烈士，紀念民主共和成立。¹³ 有關紀念日期，當時部分省分對日期定於陽曆 10 月 10 日表示疑慮，有「應配合陰曆正確時間舉行方是」之議。但黎副總統為此再覆各省，表示民國既用陽曆，故以陽曆週期為紀念，免致年年更改日期，分歧迭出。¹⁴

同年 9 月 23 日，臨時參議院接獲袁世凱大總統所交付的紀念日相關諮詢案，當日決定先作形式上的審查，於翌日報告。9 月 24 日的討論中，參議員

⁹ 〈臨時教育會紀事 十三日談話會〉，《民立報》，新紀元（1912 年）7 月 21 日，頁 7；〈臨時教育會紀事〉，《民立報》，新紀元（1912 年）7 月 23 日，頁 7；〈規定民國立國紀念日〉，《順天時報》，民國元年 7 月 20 日，版 7；我一，〈臨時教育會議日記〉，《教育雜誌》，第 4 卷第 6 號（民國元年 9 月），頁 10-11；徐友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783、1595-1596。

¹⁰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頁 87-89。

¹¹ 黎元洪，〈上大總統並致京外各機關〉，收入易國幹等編，《黎副總統政書》（臺北：文星書店，民國 51 年 6 月重刊），頁 176。

¹² 〈參議院第七十五次會議速紀錄〉，《政府公報》，第 160 號附錄（民國元年 10 月 7 日），頁 703。

¹³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頁 90。

¹⁴ 黎元洪，〈覆各省〉，收入易國幹等編，《黎副總統政書》，頁 177。

張伯烈報告審查結果，主張大總統交議之國慶日及紀念日諮詢案，引據法美兩國之歷史與中國之時勢甚為妥當，當以陽曆 10 月 10 日為國慶日紀念武昌起義，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即 1 月 1 日，及南北統一成立日即 2 月 12 日為紀念日。會中雖有數位代表提議增列其他「紀念日」，但皆以少數未獲採納，最後決議結果仍照原案通過。¹⁵ 這項由張伯烈、劉成禺等湖北省代表提出，並獲得通過的「三大紀念日之建議案」，主張民國成立以來足為紀念日者，以「剷除專制創造共和，與法美各國並駕齊趨」的陰曆 8 月 19 日武昌起義日，以「約法數章自此發生，民國基礎賴以大定」的新曆 1 月 1 日南京共和政府成立日，及以「清帝退位民國告成，五族平等四海統一」的新曆 3 月 10 日北京共和政府成立日為是。後兩者的時序已採用陽曆，日期上沒有問題，但前者的時序雖屬陰曆，但若每年仍以陰曆紀念，將不合改曆意旨，建議將陰曆 8 月 19 日認定為陽曆 10 月 10 日，以後固定於該日慶祝。¹⁶ 有關於此，引用參議院回覆政府諮詢案整理如下：

民國以陽曆為正朔，革命紀念應用陽曆，自無疑義，惟究應自何日起算，自應詳加研究，……將定名略加研究，則此問題甚易解決，定名若何，即革命紀念日與共和紀念日之分別是也。如紀念革命則應取武昌起義之日，如紀念共和則應取南京政府成立或清太后下詔宣布共和之日。查法國革命三次，……其間旋起旋蹶，政府屢易名號，其可作為紀念之日期者正復不少，然法國獨取民軍起義之第一日，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民軍攻破巴黎市獄之日。誠以法國之國節為革命之紀念日，而民軍起義之第一日即革命之起點也。美國於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九月初五開反對英國大會，……然其舉華盛頓為總統，北美合眾共和國得最後完全之組織又在數年之後，即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也。其可作紀念之日期者至為繁夥，而美國獨取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初四為惟一之國節者，誠以其國節為

¹⁵ 〈參議院第七十九次會議速紀錄〉，《政府公報》，第 170 號附錄（民國元年 10 月 18 日），頁 751；〈參議院第八十次會議速紀錄〉，《政府公報》，第 171 號附錄（民國元年 10 月 19 日），頁 753-757；〈特約路透電〉，《民立報》，新紀元（1912 年）9 月 25 日，頁 3；〈參議院二十四日議事紀略〉，《大公報》，民國元年 9 月 26 日，版 4；北京參議院特派員，〈二十三日參議院紀事〉、〈二十四日參議院紀事〉，《申報》，民國元年 9 月 30 日，版 2。

¹⁶ 〈民國之三大紀念日〉，《申報》，民國元年 9 月 29 日，版 2。

獨立之紀念日，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初四為十三州宣告獨立之日也。然則法國國節含有革命性質，美國國節含有獨立性質，故法美各國均以革命獨立之日為國節，我國國節亦應效法法美，自是一定辦法即以武昌起義之日為國慶日，而更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及北京宣布共和、南北統一之日為紀念日，以為國慶日之輔助。¹⁷

9月29日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令，正式按照參議院決議，頒布北京政府首批國定節日，定10月10日為國慶日，1月1日、2月12日為紀念日，均放假一日。當日應舉行的紀念慶祝事項有：放假休息、懸旗結綵、大閱、追祭、賞功、停刑、卹貧及宴會。¹⁸ 這三個節日的共通點在於皆具有慶祝民國成立的「祝典」性格，而其他曾在參議院中被提出，但未獲多數採納的黃花崗起義、徐錫麟以及熊成基等起義、吳樾暗殺事件、四川保路運動鎮壓事件等，則被認為意義在於追悼烈士，且較不具全國性而偏向地域性。¹⁹ 這項發布藉所謂「國慶日」的命名表現，首次明確地使武昌起義紀念日與其他紀念日差異化。自法條觀之，「國慶日」不僅是名稱，亦屬於性質標識。其他兩個「紀念日」在名稱上皆有特定紀念對象，而「國慶日」不僅與「紀念日」性質有別，名稱上亦略去「辛亥革命」或「武昌起義」，使得「國家慶典」的崇高性更加突顯。

有關於此，吳敬恆在制定過程中就數日投書報端指出，去年（陰曆）8月19日的武昌起義，其陽曆日期為10月10日，民國既改用陽曆則紀念日皆應適用陽曆。中華民國革命紀念日已由參議院同意定為每年陽曆10月10日，誠為允當。而「十月十」三字湊巧如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般易記，可援重九之例另名為「雙十節」，每年慶罷雙十節即知年事將近應整備過年，一如舊曆時代有冬至。依美、法之例，最有價值的國家大紀念日莫如10月10日武昌起義紀念，這猶如美國7月4日的渥斯頓獨立，或法國7月14日之巴黎革命般，皆為舉事之始。參議院雖提議定10月10日、1月1日和2

¹⁷ 〈國節日效法法美〉，《申報》，民國元年10月1日，版2。標點為筆者所加。

¹⁸ 〈九月二十九日臨時大總統命令〉，《申報》，民國元年9月30日，版2；〈國節日效法法美〉，《申報》，民國元年10月1日，版2；臨時大總統令，〈參議院議決國慶日紀念日案茲公布之此令〉，《政府公報》，第152號（民國元年9月29日），頁793、頁805。

¹⁹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頁93-94。

月12日為三個國家紀念日，唯1月1日建國之期恰與元旦同日，即混同慶祝，至於2月12日之統一紀念日殊無意義，蓋統一至今蒙古活佛尚未依從，該日不過為前清亡國之日，慶祝紀念不合論理。況且，欲追尋武昌起義之潛力，莫如4月27日（陰曆3月29日）的廣州起義，故以該日定為黃花節甚至比統一節更有意義，唯革命源起追源窮跡將迂曲無可確定，故以黃花節日為國家節日亦不可也。是故，論及國家節日，最直捷了當者惟10月10日。文末指出，該日當為中國惟一的國家節日，國家不僅應當慎重其事、社會亦應狂樂，如同法國歡慶7月14日般，使紀念國業與宣暢民氣相得益彰。²⁰

除了建國慶典之外，國慶日在其時尚有「致祭烈士」的功能。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擬將前清昭忠祠改建為大漢忠烈祠，是年2月陸軍部以「民國統一，所有先後死義諸先烈，應由各省建設專祠，永遠奉祀。繼思各省財力，恐未能即時舉行。因查前清昭忠等祠，多係公家建造，擬以改祀民國忠烈，建造之費既省，賞罰之義自昭。」²¹ 呈文還建議執政者在春秋致奠外，於每年8月19日武漢起義紀念日及新曆2月25日民國統一紀念日舉行祀典，永為定制。²² 同年3月，孫中山亦有〈大總統追悼武漢諸烈士文〉悼念革命烈士。²³ 這項儀式在袁世凱政權下進一步規制化，1915年北京政府政事堂禮制館所制定的《忠烈祠祭禮》，開頭提及大總統於1914年10月2日申令曰：

近年以來，國基底定，海宇粗安。迴溯艱難締造之初，悉由在事各員效命馳驅，用成殊績。其歿於戰事者，身膏鋒鏑，功在山河，追念遺徽，深堪憫惜。因思表忠之典往籍，攸崇戰死之榮列邦，所尚允宜闡揚忠烈，昭肅明裡，用勵同仇敵愾之風，益彰崇德報功之盛。十月十日為國慶之期，應由各省地方長官，將民國成立以後所有陣

²⁰ 吳稚暉，〈答客問革命紀念日應有之盛況〉，《民立報》，新紀元（1912年）9月22日，頁12；〈答客問革命紀念日應有之盛況·續〉，《民立報》，新紀元（1912年）9月23日，頁12；〈答客問革命紀念日應有之盛況·續〉，《民立報》，新紀元（1912年）9月24日，頁12。

²¹ 〈陸軍部為建先烈專祠事表揚閩都督慷慨大公電文〉，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譯組編，《辛亥革命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244-245。

²² 〈陸軍部請將前清昭忠各專祠分別改建大漢忠烈祠呈〉，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譯組，《辛亥革命資料》，頁378-379。

²³ 〈大總統追悼武漢死義諸烈士文〉，《臨時政府公報》，第43號（民國元年3月20日），頁15-16。

亡將士及其他因戰事效死之人詳細查明，一體致祭，以慰毅魄而勵群情，嗣後歲一舉行，永著為例。此令。²⁴

該書詳細規範忠烈祠祭禮定名、設位、追祭禮節及樂歌等程序，並明定致祭日期為國慶日。中華民國在國慶日中延續了前清的「昭忠」，並將這層意義擴大為對共和國的忠誠。過去，這種愛國精神可能只是成為烈士的條件之一，民國時期則被視為最高價值。²⁵

有關國慶在民初的整體面貌，Henrietta Harrison 指出，這是一個異質群體進行同質認同的場合，即使是不受中央節制的地方軍閥，也在各自的國慶典禮中宣揚愛國精神，藉以強調統治正當性。而其他各階層的群眾也藉由參與國慶，展現各自在共和國家的角色定位。²⁶ 李學智及姜瑞學認為國慶由起初的官民共同參與逐漸走向隔閡。北京政府政治紛亂，1915 年的國慶因袁世凱準備帝制，官方取消活動，社會輿論也在心理上有所預感。帝政失敗後，社會各界於 1916 年的國慶發起盛大慶祝。在意識上，經過帝政失敗及護國運動宣傳後，民眾對民主共和認識提高，知識分子與學生常藉國慶表達對統治者不滿，這在 1919 年五四運動發生後更加明顯。相對地，官方在舉辦國家慶典之餘，對群體行動則感危懼，甚至加以限制，這種官唱官調、民唱民調的情況，與民初官民一體格局不同。²⁷

另外一個和日後極為不同的是，民初國慶的象徵符號與言說論述相對地不與特定政權相繫。例如何卓恩與周游就觀察到曾為清廷官僚的袁世凱政府在有關國慶日的意義上，由於對於中華民國成立基礎觀點不同，導致他們強調「共和」多於「革命」。反之國民黨雖亦認同「共和」，但由於自我定位為

²⁴ 政事堂禮制館編，《忠烈祠祭禮》（北平：編者，民國 4 年）。標點為筆者所加。

²⁵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pp. 106-107.

²⁶ 參考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pp. 93-132; 何淑宜，〈評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近代中國》，第 147 期（民國 91 年 2 月），頁 190-197。

²⁷ 參考姜瑞學，〈北洋政府與中華民國國民塑造——以「雙十節」為中心的考察〉，頁 216-241；李學智，〈政治節日與節日政治——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國慶活動〉，頁 63-75。

清末革命勢力一脈相承的後繼者，再加上現實中反對北京政府而重啟革命，是以在詮釋上更偏重「革命」面向。²⁸

二、國民政府時期國慶日的黨化

如上所述，北伐統一後，國民黨在「革命」這個詮釋觀點得到更大的發揮空間，他們在建構黨國體制的過程中，更依照自身國民革命史觀的敘事模式，全面地將國慶日改造成為黨國專屬的政治象徵。

1928 年，國民政府將中央遷至南京，在北伐將告功成之際的國慶塑造出中國統一的新氣象。首先，是官場上的新氣象。國慶當日蔣中正等宣誓就任新職，統治階層透過國家慶典展示權力重整後結果。領導國民革命完成軍事統一的蔣中正任主席成為新的權力核心，政治實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確認。²⁹

其次，號稱有 5 萬人參加的首都紀念大會在明故宮飛機場舉行，以開放空間擴大了集體參與。當日紀念程序為開會、鳴禮砲一百零一響、全場向黨國旗行禮，恭讀總理遺囑、大會主席譚延闓致開會詞，國府主席蔣中正致詞、閱兵、並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身分向全體將士訓話、禮成。³⁰ 參與人士有政要、軍隊、一般群眾和外賓，這樣一個匯集國內外各階層人員的盛典，一定程度地展現了新政權下的新氣象。

最後，國慶前夕官方在首都第一公園烈士祠舉行追念先烈典禮，官員們向總理遺像及烈士行最敬禮。³¹ 如前所述，在國慶日祭祀先烈，等於是向世人彰顯烈士盡忠的道德，在北伐告成之際行此儀式，也有向烈士先賢秉告國民革命階段性使命業已完成的用意。此外，北方軍閥最後勢力亦早在雙十前達成妥協，國府安排東北軍閥領袖張學良於慶祝期間就國府委員職，東北於

²⁸ 參考何卓恩、周游，〈「共和」與「革命」：民初「雙十節」詮釋之演變〉，頁 155-160。

²⁹ 〈今日國府新委舉行就職典禮〉，《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0 日，張 1 版 4；〈國慶日蔣中正敬告同胞文〉，《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0 日，張 1 版 4。

³⁰ 〈首都國慶紀念大會之盛況〉，《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2 日，張 2 版 3。

³¹ 〈首都追念先烈〉，《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2 日，張 2 版 3。

國慶易幟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³²

慶祝期間的官方論述，多指出今年國慶表現出一種新氣象。黨報《中央日報》「十七年雙十國慶特刊」，以孫中山遺像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遺囑文句為刊頭，內載名人時論感懷。如李宗仁指出：辛亥以後政治建設之失敗，不得謂為辛亥革命之失敗，十七年來總理領導繼續辛亥革命之精神而奮鬥之偉大的史跡，有可得而指數焉。迄今年雙十節止，國民革命之使命可謂告一相當結束，本年雙十節的重大意義與價值，固在於既往軍事統一之成功，且尤係之於最近的將來之政治的建設。³³ 熊式輝則表示：過去十六年長期混亂下使一般民眾對雙十節極為冷漠，認為不過是一種官廳節氣，相信今後應可將辛亥革命價值從政治紛擾中突顯出來。例如過去在辛亥前即已制定，總理和黨一貫堅持的青天白日旗將可取五色旗代之，飄揚於國慶。而國民黨「以黨建國」的理念亦可實現，結束民初因羨慕英美議會政治所帶來的紛擾。³⁴

國民黨主導下的歷史詮釋和宣傳策略，將當時眾多革命團體投入革命的情況省略、簡化為總理二十餘年奮鬥釀成辛亥革命，且本黨同志發起武昌首義，雖日後軍閥列強表裡為奸，國民黨則歷經討袁護法、成立政府、清共護黨、北伐統一等奮鬥而成功，證明中國發展已由於本黨辛亥革命之成功，確立了原則方向。是以，國慶日應該認識到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勢力普及全國，中華民國已趨於建設正軌，將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將來應鞏固基礎，扶植民眾於本黨領導下，厲行革命建設事業。³⁵

國民黨雖以國民革命為號召，推翻過去廣受國際承認的北京政府，然中華民國既為初衷，故不需另立新朝，他們僅需將走偏的路線，重新拉回總理

³² 〈張學良被任國府委員後的表示 就任國府委員與易幟同時舉行〉，《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2 日，張 1 版 3。

同年 7 月，國民政府與張學良間在東三省易幟上雖一度達成共識，但在日方干涉等因素下，最終於 12 月 29 日始得實現。參考：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頁 191-194。

³³ 李宗仁，〈十七年雙十節之感想〉，《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0 日，張 1 版 3。

³⁴ 熊式輝，〈紀念十七年的雙十節〉，《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10 月 10 日，張 3 版 1。

³⁵ 〈中央宣傳部製定 國慶紀念宣傳要點〉，《中央日報》，民國 17 年 9 月 26 日，張 1 版 3；〈中宣部頒發 國慶紀念宣傳要點〉，《中央日報》，民國 18 年 10 月 9 日，張 1 版 3。

定下之正軌，確立黨國密不可分的歷史關聯即可。因此，在政體改變但國體不變的情況下，他們對於既有的歷史記憶、政治符號是據自身立場重新詮釋、挪用，而非捨棄。所謂的「宣傳史略」便不僅是顧名思義的歷史概述，而是一種預設「結構性失憶」的「歷史省略」。在國民黨勢力範圍內，青天白日黨旗與滿地紅國旗並陳，孫中山遺像、三民主義國歌、國民革命史觀便取卿雲歌、五色旗而代之，也成為中國國慶日的新意象。

雙十國慶成為黨國慶典。然而，現實上國內外政治、軍事情勢都不如所願。國內再度陷入戰亂之後，慶祝氣氛就不那麼熱切。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間，由於戰事之故，國府數度以國難期間應當簡約為由，通令是日除舉行紀念會外，其他閱兵、慶典及招待外賓等禮節均取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這種因應戰時的紀念方式又成為常態。³⁶

時人亦對當時社會反應留下觀察，如 1929 年的《國聞週刊》稱，由於內外時局之故，人民心中似不及去年國慶之樂觀。³⁷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面臨黨內要求下野的國府主席蔣中正正在國慶當夜見首都街上行行人稀少，也黯然留下「我國人減少國慶歡情」的字句。³⁸ 1935 年黨中央常務委員居正在國慶演說表示，有人憤慨國難當頭還有何心情高興慶祝，有人則感嘆雙十節越來越冷清，從過去有提燈會的熱鬧遊行，到今日連儀式亦將不可復觀。³⁹

中日戰爭期間，汪精衛的國民政府同樣慶祝雙十國慶。1940 年汪於南京國府成立該年的國慶日感言表示：中日和平親善，將使總理孫中山所懷抱之大亞洲主義臻於實現。日德義同盟成立，實為東亞滌除帝國主義之餘毒，中國自拔於次殖民地之良機。⁴⁰ 當時同時存在的兩個國府，皆在國慶中宣稱繼

³⁶ 參考〈國慶日紀念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目錄號：068，案卷號：80；「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十月十日國慶紀念辦法與舉行儀式」、「國慶觀賀典禮國內外援例舉行與招待外賓案」、「雙十節紀念辦法三項」、「國慶紀念辦法兩項新案」，〈紀念節日案（八）〉，《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51616011。

³⁷ 〈雙十節與時局〉，《國聞週報》，第 6 卷第 40 期（民國 18 年 10 月 13 日），頁 1。

³⁸ 「國慶日蔣中正往開慶祝大會及舉行閱兵典禮」，〈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年十月〉，文物圖書一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41010。

³⁹ 〈中央與國府 昨舉行國慶紀念〉，《中央日報》，民國 24 年 10 月 11 日，張 1 版 2。

⁴⁰ 汪精衛，〈國慶日感言〉，收入中國國民黨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暨職工會宣傳科編，《國慶紀念特刊》（出版地不詳：編者，民國 29 年 10 月），頁 2。

承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重慶國府強調的是民族獨立的實現，南京國府則要追求大亞洲主義的達成。國共合作架構下的共產黨政權，也在此一場合作符合統治理念的政治表述。⁴¹ 這說明節日雖保有特定歷史記憶，但這個記憶如何解釋、運用，與現實的政治需要作連結，則存在著權力者任意發揮的空間。

1945 年抗戰勝利後，歡欣氣氛反映在重慶的國慶場合，當日國府大禮堂及各界皆有盛大集會。⁴² 南京有何應欽以陸軍總司令身分率員謁中山陵祭告國父，後至明故宮飛機場主持慶祝勝利大會。⁴³ 該年國共展開重慶會談，簽定雙十協定，唯此和平氣氛隔年便不復見。1946 年還都南京後首次國慶紀念，蔣以廣播向共產黨喊話稱，中國雖已獨立於世界，但今日中國內部若無統一，就沒有和平，呼籲停止衝突。⁴⁴

1947 年，國府原本擬議規定將對陣亡將士每年春秋二祭的時間統一訂於 3 月 29 日革命先烈紀念日及雙十國慶日，但關於秋祭時間，有關機關認為：「國慶除舉行慶祝外，尚須接受外賓觀賀，有時尚須舉行閱兵、授勳、茶會等項，恐時間上不敷支配，且春祭為 3 月，秋祭改為 9 月，似較 10 月為宜。」⁴⁵ 同年 6 月公布的「春秋二季致祭陣亡將士辦法」中，秋祭時間確定改於同為國定紀念日的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⁴⁶ 此後，國慶日制定之初曾存在的「致祭烈士」性質不再被彰顯。

⁴¹ 丸田孝志，〈抗日戦争期・内戦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象徴 国旗と指導者像〉，《アジア研究》，第 50 卷第 3 号（2004 年 7 月），頁 1-20；丸田孝志，〈時と権力——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記念日活動と新暦・農暦の時間（I）、（II）〉，《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 10、11 号（2005 年 3 月 31 日、9 月 30 日），頁 27-46、57-73。

⁴² 〈中樞慶祝國慶典禮 蔣主席重申建國大任〉、〈陪都各界盛大集會 熱烈慶祝國慶〉，《中央日報》，民國 34 年 10 月 11 日，版 2。

⁴³ 〈首都舉行謁陵禮 何總司令主祭嚴肅隆重 軍民五萬祝勝遊行長達十里〉，《中央日報》，民國 34 年 10 月 11 日，版 3。

⁴⁴ 〈卅五週年國慶紀念 主席廣播昭告同胞〉，《中央日報》，民國 35 年 10 月 10 日，版 2。

⁴⁵ 「茲定於本月卅日上午九時在國府會議室開會商討今後對陣亡將士每年春秋二祭辦法即希查照出席」，〈紀念節日案（二）〉，《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51616005。

⁴⁶ 國民政府訓令處字第 663 號：「春秋二季致祭陣亡將士辦法，茲經制定，應即通飭施行」，《國民政府公報》，第 2858 號（民國 36 年 6 月 23 日），頁 5。

1949 年，國民黨在中國的情勢已經相當惡劣，主持中樞儀式的代總統李宗仁，在廣州誓與共匪作生死鬥爭。⁴⁷ 然而，這樣的文告只是最後的禱告。從此這個代表著共和中國新生、象徵意義崇高神聖的紀念日就在作為其共同體想像之主體的中國大陸敲下終聲，移入臺灣。

叁、戰後臺灣九〇年代前國慶日舞臺的前與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至九〇年代之間，在兩蔣主導的黨國威權體制下，國慶日無疑是各節日中國民黨政權展示統治正當性，凝聚國民共識的最佳舞臺。雖然中華民國已偏安一隅，但從兩蔣統治時期對國慶日投注的心力與資源、整體社會的動員程度，以及廣電媒體等傳播條件的發達來看，的確是整體國慶日歷史最精采的一段時期。在本節，將先集中在偏向硬體面的國慶大典舉辦模式，討論這種舞臺前的萬眾一心如何被塑造、呈現，而舞臺後的異議、騷亂，又如何被管制、抹滅。至於這段時期國慶日中常見的歷史敘述、宣傳方針等軟體面，則留待下一節探討。

一、國慶舞臺的臺前

1. 全國軍民的神聖祝禱：中樞紀念與領袖文告

中央政府遷臺後，蔣中正執政時期依例會在國慶前夕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供各大報在當日以頭版頭條刊載。考察這份〈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內容，可以歸納出一定的行文模式。在第一部分，通常都會反覆提及國民黨自辛亥革命以來光榮的國民革命歷史，繼之第二部分則不斷指出對岸共匪在現實上施政的圖窮匕見，標舉反攻復國的時代任務，第三部分就是激勵士氣的喊話，宣示國民革命最終階段必定成功。如果將雙十國慶文告和開國元旦文告兩個文本對照觀之，一則頒布於一年之初，一則頒布於年終將至時，若

⁴⁷ 〈李代總統昭告同胞 誓與匪作生死鬥爭 粉碎蘇帝奴役中國人民的野心 中樞昨隆重慶祝國慶〉，《中央日報》，民國 35 年 10 月 11 日，版 2。

說開國文告為該年度的反共復國工程訂下目標，那麼國慶文告應可視作兼為一種年終檢討的性質。例如：1959 年國慶文告稱：

大家一定還記得，中正在今年元旦，曾經指出今年這一年，將是我們造成奸匪崩潰的決定年，亦就是我們反攻復國勝利的決定年！雖然我們軍事反攻行動，現在尚未開始，而大陸奸匪，自從去年金門戰敗以後，在這一年間，所顯現的事實，就已證明我們確已得到這一決定年的證驗，也就是我們得到了反攻復國必然成功的證驗。⁴⁸

當蔣中正年復一年在開國文告中堅稱今年是反共「勝利年」、「關鍵年」、「決定年」等語，而實際的軍事反攻行動卻年年拖延時，國慶文告就有宣稱本年度雖然尚未展開正式反攻行動，但全國上下的堅實準備與國內外情勢的發展，在在顯示我方優勢，而本年年初昭示的目標也已達成。

即便在六〇年代以後實質的軍事反攻在形勢上更加不利，蔣中正仍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等官方動員與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抗，繼續在國慶文告中強調反共最重要的是精神力量，而非人口或物力的眾寡。1972 年的國慶，面對失去聯合國席位和與日本斷交後的打擊，自該年起由於健康因素，蔣中正無法出席中樞紀念和國慶大會，才改由副總統嚴家淦代表宣讀文告。⁴⁹ 總而言之，蔣中正是非常重視節日文告的，不僅篇幅特長、修辭豐富，對於年年相類的內容也不厭其煩地反覆講演。

前引 1959 年國慶文告正是發表於 1958 年蔣杜公報之後。該年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簽署聯合公報聲明：「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之後，雖然美國方面認為已取得蔣中正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的聲明，但國民黨政權則重視團結士氣的宣示意義，在主觀意願和對內宣傳

⁴⁸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國慶 總統昭告全國軍民 勝利光輝已在掌握〉，《中央日報》，民國 48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⁴⁹ 〈中樞隆重慶祝國慶 嚴副總統主持盛典〉，《中央日報》，民國 72 年 10 月 11 日，版 1。

上都不承認該項公報有礙軍事反攻，⁵⁰ 即便日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轉向「文化中國」、「精神反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看起來像是一步步落實了公報內涵，⁵¹ 但正如引文所示，國慶文告短時間內尚看不出明顯的立場改變。然而隨著客觀環境對軍事反攻愈形不利，正如若林正丈引用 Brian Crozier 形容蔣中正治下「光復大陸」意識型態的那句話：「它開始是斷然的決定，接著昇華為熱切的希望，然後變成神話，最後則變為祈禱文。」所說的，「光復大陸」雖仍在國慶文告等官方文字遊戲中反覆出現，但實質影響已失去大半。⁵²

嚴家淦總統任期僅為過渡性質，國慶文告看不出特別改變。1978 年蔣經國在就任總統後首次大典中發表〈雙十國慶祝詞〉，內容雖仍不出國民革命史觀，內容卻有明顯省短，並不再以「軍民」為呼告對象，改稱「同胞」。⁵³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蔣時期國慶文告的呼告對象，無論是以全國軍民、同胞為範圍，無疑都涵蓋中國大陸的「同胞」在內。國民黨宣稱唯一代表中國，將共產政權視作匪偽竊據，而中國大陸人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是絕對反匪仇匪，與匪為敵的」，「他們不但不是屬於奸偽匪共的『人民』，他們正是我們國民革命在大陸上先遣的一支預備大軍。」⁵⁴ 因此，在臺灣發表的國慶文告，文中所提同胞不限於臺灣住民，而是為數數億的全體中國人民。唯一被排除在這個中國人群像之外的，只有「那一小撮」共產主義匪偽分子。實際上這些國慶文告也的確會透過空飄氣球、海外廣播等各種管道，伴同元首玉照及文宣，試圖送往中國大陸，⁵⁵ 讓「大陸同胞」同享國慶之喜。

⁵⁰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完整版）》（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 2 月），頁 438-441。

⁵¹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民國 90 年 12 月），頁 288。

⁵²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3 月 2 版），頁 172。

⁵³ 〈總統發表雙十國慶祝詞號召全民承擔重責大任 為反共復國神聖使命奉獻一切心力〉，《中央日報》，民國 67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⁵⁴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國慶 總統號召全國軍民 造成又一次大結合〉，《中央日報》，民國 49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⁵⁵ 柯仁，〈對大陸實況轉播〉，《中央日報》，民國 67 年 10 月 28 日，版 10。

2. 國家大典中的官方動員：閱兵、集會及遊行

國慶大典中的集體參與，有首都舉行的閱兵、各地的國慶集會、燃放煙火、提燈遊行等不同形式。有關閱兵，中央政府在臺首次舉行，為 1951 年。⁵⁶如表 1 所示，蔣中正執政早期幾乎年年閱兵，它是軍事反攻大陸實力的展現，其後當六〇年代中期後軍事反攻為現實條件所困，蔣身體狀況走下坡後，閱兵頻率就顯著減少。1971 年建國六十週年慶是蔣最後一次出現在國慶大典上，⁵⁷1975 年蔣逝世，該年為嚴家淦繼職及提振全國民心而舉行閱兵，往後只有在總統就職或建國逢十週年慶才會閱兵。可以說，蔣中正任內的國慶，相對而言具有較強的軍事性格，後期閱兵則是供新任總統就職或逢十週年慶檢閱軍力和凝聚士氣所用。

表 1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後歷次國慶閱兵一覽表（截至 1996 年）

民國紀年	演習名稱	大閱官／閱兵指揮官	受校總人數
40		蔣中正／艾靈	約 100,000 人
41	復華	蔣中正／唐守治	約 100,000 人
42		蔣中正／周雨寰	約 50,000 人
43		蔣中正／徐汝誠	未公布
44	光華	蔣中正／鄭為元	數萬人
45	光復	蔣中正／劉鼎漢	約 100,000 人
46	中興	蔣中正／胡炘	約 10,000 人
49	鼎興	蔣中正／朱元琮	約 13,000 人
50	復興	蔣中正／鄭為元	約 20,000 人
52	復漢	蔣中正／袁國徵	約 11,000 人
53	興漢	蔣中正／郝伯村	約 11,000 人
64	大漢	嚴家淦／張家俊	35,000 人(含預備部隊 25,000 人)
67	漢威	蔣經國／蔣仲芴	12,166 人
70	漢武	蔣經國／許歷農	11,966 人
77	光武	李登輝／陳廷寵	13,892 人
80	華統	李登輝／羅文山	12,566 人

資料來源：王炯華，〈今年國慶日 不舉行閱兵〉，《中央日報》，民國 85 年 8 月 5 日，版 4；林柏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國慶閱兵的政治意義——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949-1964）〉，《史學彙刊》，第 23 期（2009 年 6 月），頁 193-224。

⁵⁶ 〈陸海軍閱兵禮 陸總海總各在駐地舉行〉，《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⁵⁷ 〈建國六十年國慶日 總統伉儷接受歡呼〉，《中央日報》，民國 60 年 10 月 11 日，版 1。

然而，在蔣中正年年疾呼的「反攻大陸」戰鬥氣氛下，閱兵本質上仍然是儀式、宣示性的，顯得與政策宣稱的「備戰」有些矛盾。民初參議院審查國慶日行事時曾稱：「本會審查之時，以為大閱一層關於兵事，恐一日間不能作到，後經大家討論，以為是日大閱不過觀光兵事整齊而已。」⁵⁸ 閱兵操演本來就是一項展示軍備實力和國家威信的儀式性行為，按過去經驗，若一場戰事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時，就必須務實地考慮暫停。三〇年代在國難、簡約的考量下，皆曾取消閱兵。蔣中正正在臺執政少數未舉行國慶閱兵的年度，如 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戰或 1959 年的八七水災等戰況或救災等非常之際，⁵⁹ 或是 1962 年官方聲明「當前對岸匪軍積極部署，迄未停止，隨時可能蠢動。我三軍須時刻警戒防衛。本年雙十國慶閱兵，決定暫停舉行。」⁶⁰ 所示者，亦基於類似的考量。因此，「反攻大陸」雖然年年要作，但戰後臺灣早期頻繁的國慶閱兵，還是激勵民心士氣的儀式性功用較大，也暗示了反攻大陸年年準備，卻年年延宕的形勢。

將國慶日和開國紀念日中存在的政治宣示兩相對照，閱兵的儀式性功能將更加顯明。在歷年的開國紀念日〈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蔣中正每每以「今年是反攻決定年」、「準備年」、「關鍵年」、「勝利年」等語，⁶¹ 為每年的國家目標頒布題解，當每年行將告終，而計畫中的反共行動又將展延時，國慶日的軍事閱兵在現實上不僅適當滿足展示軍威的期望，也向國人保證反共大業的籌畫從未鬆懈，即便它是一張不知何時方能兌現的復國支票。

另外一項重要的官方集會活動，即國慶大會。由總統親自主持的中樞層級活動，通常只有府內紀念會和府外閱兵，下午的全國慶祝大會則由其他政要主持。若不舉行閱兵，國慶大會就挪至上午在府前由總統親自主持。蔣中正逝世後，基本上由於閱兵頻率已大幅降低，因此國慶大典也取代閱兵成為國家元首作為主角露臉的場面。

⁵⁸ 〈參議院第八十次會議速記錄〉，《政府公報》，第 171 號（民國元年 10 月 19 日），頁 753。

⁵⁹ 林柏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國慶閱兵的政治意義——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949-1964）〉，頁 216。

⁶⁰ 〈今年國慶閱兵暫停舉行〉，《中央日報》，民國 51 年 9 月 14 日，版 1。

⁶¹ 紀慧君，〈我國元首論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三年元旦文告之語藝分析〉，頁 57。

舉 1972 年為例，該年中華民國接連受到失去聯合國席位和與日本斷交的衝擊，官方在國慶大會中實施忠誠作業、大會雙十作業及擁元案等計畫。忠誠計畫動員學生組成「總統萬歲」巨型字幅，顯示全民效忠領袖的赤忱。雙十作業指揮動員學生手持紙花，顯示雙十圖案。擁元案則是為表達海內外同胞熱愛國家擁戴總統赤忱，以海外僑團、大陸在臺同鄉會及學生各單位遊行。官方要求同鄉會遊行應精心設計富有意義之持用物品，表現各省市文化民俗特色，以求激勵全國軍民同胞光復河山決心。⁶² 有別於閱兵威武莊重的氣氛，國慶大典中來自各界的動員象徵著國慶大典所涵括的包容性。就官方而言這也代表各階層對中央的向心力。然而，像是總統玉照隊、中國大地圖隊及來自包括蒙古、西藏及新疆等在臺同鄉會代表或海外華僑等，這些都是被官方允許在慶典中「合法」出現的國慶意象，在歡愉氣氛的背後牢固地存在著權力的控制。

二、國慶舞臺的臺後

以上所述這些節慶中的秩序井然與歡欣鼓舞，其實是強人在高處凝視下，要求國民有志一同的結果。例如閱兵規模浩大、歡欣鼓舞操演的背後，背後存在著耗費人力物力的布置、排練，甚至是周邊地區到達擾民程度的治安檢查。⁶³ 較平面媒體更具渲染力的廣電媒體裡，閱兵大典實況、綜藝戲劇特別節目、三臺聯播自強晚會等等透過傳播，使節日氣氛更加催化。然而，這些節目雖名為「特別」，實質上卻充斥既定思維，限制了各種可能。新聞從業人士盛竹如對當時的國慶聯播晚會曾有如下看法：

到了十月十日國慶日，晚間又來了個「勝利晚會」由三家電視臺聯播，一個半小時的節目，全是在呼口號，喊萬歲。這以後，聯播成了電視臺奉令必做，也是最無意義的節目了。⁶⁴

⁶² 參考不著撰人，《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六十一年國慶大會大會遊行手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民國 61 年 10 月）。

⁶³ 李錦容，《臺灣女英雄陳翠玉》（臺北：前衛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101-102。

⁶⁴ 盛竹如，《螢光幕前——盛竹如回憶錄》（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10 月），頁 119。

節日期間的新聞處理上也要配合或體察上意，態度必須格外謹慎。以 1966 年為例，盛竹如關於 1966 年十月慶典的新聞工作原則就曾有如下敘述：

回頭談談當年的十月慶典。那還屬於白色恐怖時代，每當十月份來臨所謂普天同慶之時，也是我們電視及新聞工作人面臨關頭要度過艱難困苦一個月之時。首先，十月一日是中國大陸的國慶日，十月開始的這一天我們還不能表現出興奮，大陸國慶固然絕不能提，任何祥和預兆的新聞，也都不要播。過掉三、五天，這是要開始提昇迎接國慶、海內外萬眾一心的情緒了，所有的報導，全是正面的，全是鼓舞民心士氣的，不能有所偏差；雙十節這一天，當然是萬民歡欣、普天同慶，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社會新聞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所有的電視畫面都顯出，好像全世界都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國慶。這一天只要不出毛病，順順利利過去，這個難關便過去一半了。緊接著，仍然瀰漫在十月慶典的歡欣中，臺灣光復節，總統要發表文告，又是一個高潮，然而真正最大的高潮，在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總統華誕。這一天更得特別留心，不可犯忌諱，更不可有不吉利的新聞出現，我記得這一天所有報紙的電影廣告，任何片名有不吉利字眼出現，都會被塗抹掉，……。⁶⁵

國民黨政權對於雙十慶典萬眾一心、四海同歡的場面營造是出於有意識的計畫。根據 1968 年一份黨部宣傳資料就指出：從雙十國慶開始到 11 月的國父誕辰之間是一連串的慶典活動，由於國內外皆有許多民眾、華僑及外賓共襄盛舉，因此對於臺澎地區的秩序治安也必須特加注意，以防不法分子活動的可能發生。在此一大原則下，各新聞傳播單位對不良社會新聞都應儘量減少刊載，以留下篇幅與時間來宣傳與慶典有關的事情。⁶⁶ 這些幕後實情在在顯示節日慶典的本質就是一場表演，而雙十國慶在其中居於首要地位，在黨國體制標舉的國家大義下，全國上下都有配合盡力演好這場戲的義務。

1976 年雙十國慶發生了「王幸男郵包爆炸案」，這個事件是當時的異議

⁶⁵ 盛竹如，《螢光幕前——盛竹如回憶錄》，頁 41-42。

⁶⁶ 〈慶典期間注意心防工作〉，《時事週報》，第 16 卷第 15 期（民國 57 年 10 月 11 日），頁 7。

人士王幸男等人為攻擊黨國政要所策畫的，臺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為此炸傷左手，甚至截肢。⁶⁷ 由於案發當時正逢國慶日，《中央日報》所採中央社通稿如圖 1 所示稱：「臺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於十日下午二時許，在家中拆閱書報時，左手受傷。蔣院長親往探視慰問。謝主席傷勢正在由醫生細心診治中。」在報紙版面下方刊出一則篇幅極小的報導，⁶⁸ 黨國政要遭受恐怖攻擊，相關報導卻將受傷經過以隱晦筆法描寫，彷彿一樁小意外，與其他慶祝消息的新聞版面不成比例，表現出黨國威權監控下社會輿情的「版面政治學」。⁶⁹

謝主席左手受傷
蔣院長親往探視
慰問。
謝主席傷勢正由醫悉心診治中。

【本報訊】臺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於十日下午二時許，在家中拆閱書報時，左手受傷。蔣院長會親往探視慰問。

圖 1

資料來源：〈謝主席左手受傷 蔣院長親往探視〉，《中央日報》，民國 65 年 10 月 11 日，版 3。

肆、黨國體制下國慶日「正統中國」意象的形塑

上一節談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國民黨如何在黨國威權體制及反共復國軍事氛圍下，於最後的反共基地經營國慶日的硬體面。這一節將整理、歸納國慶日中主要的幾種詮釋或宣傳內容，無論是辛亥革命、正偽國慶或是四海一心，這些項目都攸關「正統中國」的形塑。過去這種競爭曾經出現在中

⁶⁷ 薛化元，〈王幸男郵包爆炸案〉，收入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 2 版），頁 210。

⁶⁸ 〈謝主席左手受傷 蔣院長親往探視〉，《中央日報》，民國 65 年 10 月 11 日，版 3。另外，不僅國民黨黨報，其他大報如《聯合報》也以同樣隱晦的方式報導這則消息。〈謝東閔 拆閱書報左手受傷〉，《聯合報》，民國 65 年 10 月 11 日，版 3。

⁶⁹ 陳順孝，〈臺灣報紙版面政治學初探——1945-2004 重大事件的新聞建構〉，《臺灣史料研究》，第 24 號（2005 年 3 月），頁 148-149。

華民國南北分裂，或是國民政府蔣汪分裂等時期。國民黨政權遷臺後，由於共產黨捨棄舊國號另立新中國，使得「正統中國」的競爭焦點更顯複雜，而此一複雜局面又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的長期持續下常態化。於是，為了對內對外確保、宣稱統治正當性，國民黨在本屬中國邊陲的反共基地臺灣上所投注的，形塑「正統中國」的心力，遠較過去更多。

一、黨國敘事與辛亥革命：歷史詮釋權與自我正當化

辛亥革命是繼承了中華民族五千年倫理道德固有文明的傳統，創立了二十世紀民主科學現代國家的規範，更是開闢了亞洲和世界弱小民族平等自由的先河。在五十年以前的今天，由於我們 國父和開國先烈，揭櫫三民主義的目標，發揚國民革命的精神，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風起景從，我們乃在亞洲首先建立了第一個民主自由國家，揭開了萬丈光芒的亞洲民主自由的歷史序幕！⁷⁰

在前面有關民初國慶日的討論中，可以瞭解辛亥革命的歷史定位及並非國民黨所獨斷，北伐統一後，有關國慶日或辛亥革命的敘事則可見明顯黨化的傾向，後來這種官定歷史記憶的建構由於國共內戰失利，使得詮釋權在中國大陸為共產黨接收。國民黨來臺以後，由於全面性地掌握了國家機器，辛亥革命的再現也由其主導，強調該黨自興中會以來的正統性，將其時泛稱的革命黨與當下國民黨劃上完全的等號。

在此，孫中山及蔣中正的個人角色被賦與絕對地位，與其同時，辛亥革命也被收編為國民黨國民革命史觀的一個階段。如 1965 年的國慶文告即指出廣州北伐之師、長江剿匪之師、對日抗戰之師、反共復國之師等是繼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國民革命四大戰役，勉勵要以國父先烈開國的堅毅精神來復國，要以北伐打倒軍閥的奮鬥精神來討毛，要以八年抗戰的犧牲精神來光復大陸，要以建設臺灣的實踐精神來重建各省。⁷¹

⁷⁰ 〈中華民國五十年國慶 總統昭告全國軍民 反攻復國行動指標〉，《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⁷¹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 總統書告全國同胞〉，《中央日報》，民國 54 年 10 月 10

每逢雙十，黨國媒體充滿追懷辛亥革命和中國大陸時期國慶紀念的追憶文章，也有各種形式的藝術呈現，例如 1952 年國民黨黨史會與臺灣省博物館舉辦國慶史展，展覽主題以「國父誕生」始，以「黨改造完成」終，內容皆是突顯國父孫中山、總統蔣中正和國民黨的正面角色，展館入口更是直捷了當地在國慶史展下方掛上「國父與總統」的副標。⁷² 另如圖 2 所示 1961 年梁中銘的開國五十年國慶漫畫，分為武昌首義、民國肇造、肇和起義、黃埔建軍、國父逝世、誓師北伐、公佈約法、剿匪救國、抗日戰爭、推選總裁、締訂新約、開羅會議、勝利受降、實施憲政、青年奮起、義士歸國、反攻必勝等十七個部分，呈現出辛亥革命以來中華民國的發展。⁷³ 這個漫畫明顯而典型地突出國民黨或孫中山與蔣中正兩人角色，彷彿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在兩位偉人領導下從未歷經失敗。

然而，紀念辛亥革命並非國民黨專利，中國大陸這種官定歷史記憶的詮釋權由共產黨接收。1961 年，中共首次大規模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⁷⁴ 經過七〇年代的文革紛亂，八〇年代走向「改革開放」後，於 1981 年盛大舉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其規模固然不比十一國慶，但往後每隔十年就有大規模紀念，其餘週年紀念各地亦有活動舉行。共產黨基本上雖然將辛亥革命視作由小資產階級發動而未盡其功的革命，但仍然對其推翻封建王朝的歷史意義給予評價。這種史觀每每被應用在各種具體的歷史撰寫或紀念建設中，如 1958 年 5 月 1 日國際勞動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揭幕的「人民英雄紀念碑」，⁷⁵ 浮雕裝飾上展示的八個歷史主題中，辛亥革命就與其他諸如鴉片戰

日，版 1。

⁷² 〈國慶史展今揭幕 自國父誕生至本黨改造 許多新資料均加入展覽〉，《中央日報》，民國 41 年 10 月 10 日，版 3。

⁷³ 梁中銘，〈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史畫〉，《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10 月 10 日，版 10、11。

⁷⁴ 〈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舉行第二十一一次會議 決定隆重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報》，1961 年 9 月 16 日，版 1；〈政協常委會舉行第十三次全體會議 決定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人民日報》，1980 年 10 月 8 日，版 1；〈政協常委會第 12 次會議舉行全會 今年將隆重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人民日報》，1991 年 1 月 9 日，版 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舉行辛亥革命 90 周年紀念活動的決定〉，《人民日報》，2001 年 3 月 1 日，版 4。

⁷⁵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建造人民英雄紀念碑，以紀念為建立新中國而犧牲的人。1952 年興建委員會成立，同年

爭、太平天國、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重點放在中共游擊戰），及國共內戰中解放軍南渡長江等近代史蹟同列，⁷⁶ 被中共官方收編為共產主義革命建國歷史進程的其中之一。當然，作為新中國的唯一統治者，共產黨本來就沒有必要放棄這段連結兩個斷代之歷史事件的詮釋，無論是將之評價為一場小資產階級的失敗革命，或是推翻封建王朝的歷史時刻，皆對自身政權歷史定位及統治正當性的宣傳有所助益。

不消說，在對國民黨或臺灣社會作政治批判或統戰喊話的面向上，它更被視作是一個可以連結國共、中臺共同歷史認識與情感的工具，其論調則依中共對臺政策的轉變而改變。七〇年代以前，國共在冷戰結構下皆保持彼此兵戎相向的態勢，周恩來於 1961 年的紀念致詞中，就批評蔣中正背叛孫中山與革命，「解放臺灣」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後奮鬥目標。⁷⁷ 歷經七〇年代的國共國際地位逆轉，八〇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在不放棄武力的前提下，對臺改採懷柔政策，以「和平統一」呼籲回歸祖國。⁷⁸ 諸多紀念談話中，在中國大陸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黨左派革命委員會幹部特別引人注目。例如代主席王崑崙和副主席屈武皆以溫情喊話，指出近代中國歷史皆由國共合作所推動，國民黨的出路在國共合作，臺灣的出路在祖國統一。⁷⁹

對此，國民黨當然抱持批判態度。例如 1961 年中共籌慶五十週年紀念時，國民黨就批判那是一種詭譎措施，除國慶文告批判共產黨是以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歷史與精神，為其惟一勁敵外，⁸⁰ 黨刊《時事週報》中亦提及

8 月 1 日正式動工興建，1958 年 5 月 1 日在擴建後的天安門廣場上落成揭幕。參考洪長泰，〈寫在石頭上的革命歷史：一座國家紀念碑的建造〉，收入氏著，《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 5 月），頁 303-329。

⁷⁶ 洪長泰，〈寫在石頭上的革命歷史：一座國家紀念碑的建造〉，頁 317。

⁷⁷ 周恩來，〈開會詞——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人民日報》，1961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⁷⁸ 〈社論：統一祖國 振舉中華——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9 日，版 1。

⁷⁹ 屈武，〈辛亥革命與兩黨合作 紀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8 日，版 5；王崑崙，〈共寫千秋大業新篇章 紀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人民日報》，1981 年 10 月 9 日，版 3。

⁸⁰ 〈中華民國五十年國慶 總統昭告全國軍民 反攻復國行動指標〉，《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10 月 10 日，版 1。

數項宣傳要點：首先，要指出共匪紀念我辛亥革命五十週年，足以證明大陸同胞仍懷念中華民國，對其極權統治深惡痛絕，共匪無法將之破壞才以緩和的欺騙手段應對。深信大陸同胞必能對此洞若觀火，使反共革命運動更普遍。其次，要注意共匪宣傳紀念辛亥革命，顯有僭竊國民革命歷史傳統之陰謀，這顯示匪偽政權已瀕臨崩潰，不得不偽裝繼承本黨之革命傳統。這證明由國父和總統所領導建立的光榮革命歷史及中華民國已深入人心。此外，共匪宣傳紀念辛亥亦是海外統戰陰謀之一，掩飾其出賣祖國的逆行，以離間海外華僑及國際人士。⁸¹ 黨方面並補充，在宣傳上要強調中華民國是歷史傳統的繼承者，是依憲法成立的唯一合法政府。⁸²

七十週年紀念時面對溫情喊話，蔣經國總統仍於 1981 年〈建國七十週年國慶祝詞〉中，再度批評對方進行統戰是無恥勾當，妄想篡奪國民革命歷史，竊取辛亥開國的榮耀。⁸³ 這一段時期官方發布的〈十月份重要紀念節日各項活動指導綱要〉在雙十國慶的宣傳要旨上，也通常強調要駁斥共匪妄稱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必須「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完成，中國革命才算成功的謬論，以及共匪歪曲辛亥革命，企圖篡奪中國革命正統的陰謀。⁸⁴

總而言之，戰後臺灣黨國體制下國民黨將國慶日和辛亥革命繼續當作自己的資產，並較過去更全面地藉由教育、傳播等機器對民眾進行灌輸，對外則藉此與共產黨政權進行政治宣傳鬥爭。但是，由於國共兩黨皆堅持著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的政治鬥爭，辛亥革命也成了一道不解之結，令雙方在歷史詮釋上進行較量。辛亥革命本非兩黨任何一方的專屬特權，但在黨國體制下長期執政中華民國，當時亦繼續藉以宣稱統治正當性的國民黨，是將之視為「建國」的一個起點；相對於此，已在中國大陸上建立新國家的共產黨，則形容

⁸¹ 〈宣傳通報：第三〇六號〉，《時事週報》，第 2 卷第 26 期（民國 50 年 9 月 29 日），頁 3。

⁸² 〈慶祝本年國慶紀念 宣傳要點補充提示〉，《時事週報》，第 3 卷第 1 期（民國 50 年 10 月 6 日），頁 3。

⁸³ 〈中華民國七十年國慶 蔣總統號召全國同胞 為實行三民主義奮鬥〉，《中央日報》，民國 70 年 10 月 10 日，版 1。

⁸⁴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函 73 教五字第 62546 號，〈摘錄「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份重要紀念節日各項活動指導綱要」有關省屬社教機構及公私立學校應行配合事項，請查照辦理〉，《臺灣省政府公報》，秋字第 64 期（民國 73 年），頁 7。



民治縣政府 財政科 第一二一號



石開中書省吏部一聚江蘇等處大興武義
國權、德源、石豐、德山、十元、日軍、丁
的所經紀，就該地會集月籍民壯，再行，連軍城鎮商
高麗從各邑火器在縣官十一處社稷廟焚燒劫掠民傷死



門一息。與三月廿日。在荷蘭國十四。英年三十三。世題父國



黃埔建軍 三國年十民



約了期會去上座某佛事場與四月四日於共夢 錢起和張 3
國家，錢起官，劉國光長官今滿五年。資料
夢江等縣與共計約事與數在地方十日間，錢起，劉國光
。其後，其官事與。以上統計二圖資料與各心手與



理應予以撤換。但令其留任乃因該機，係由粵省派駐，故由粵省撤換。該機係由粵省派駐，故由粵省撤換。該機係由粵省派駐，故由粵省撤換。



● 約克時報。此報，是紐約的領導報章，該報
 在打金全州，有十萬中利，因政府削減在父
 此公報，雖然係地方性報章，但對紐約，此報十
 極重要，該報與紐約，有一度又與紐約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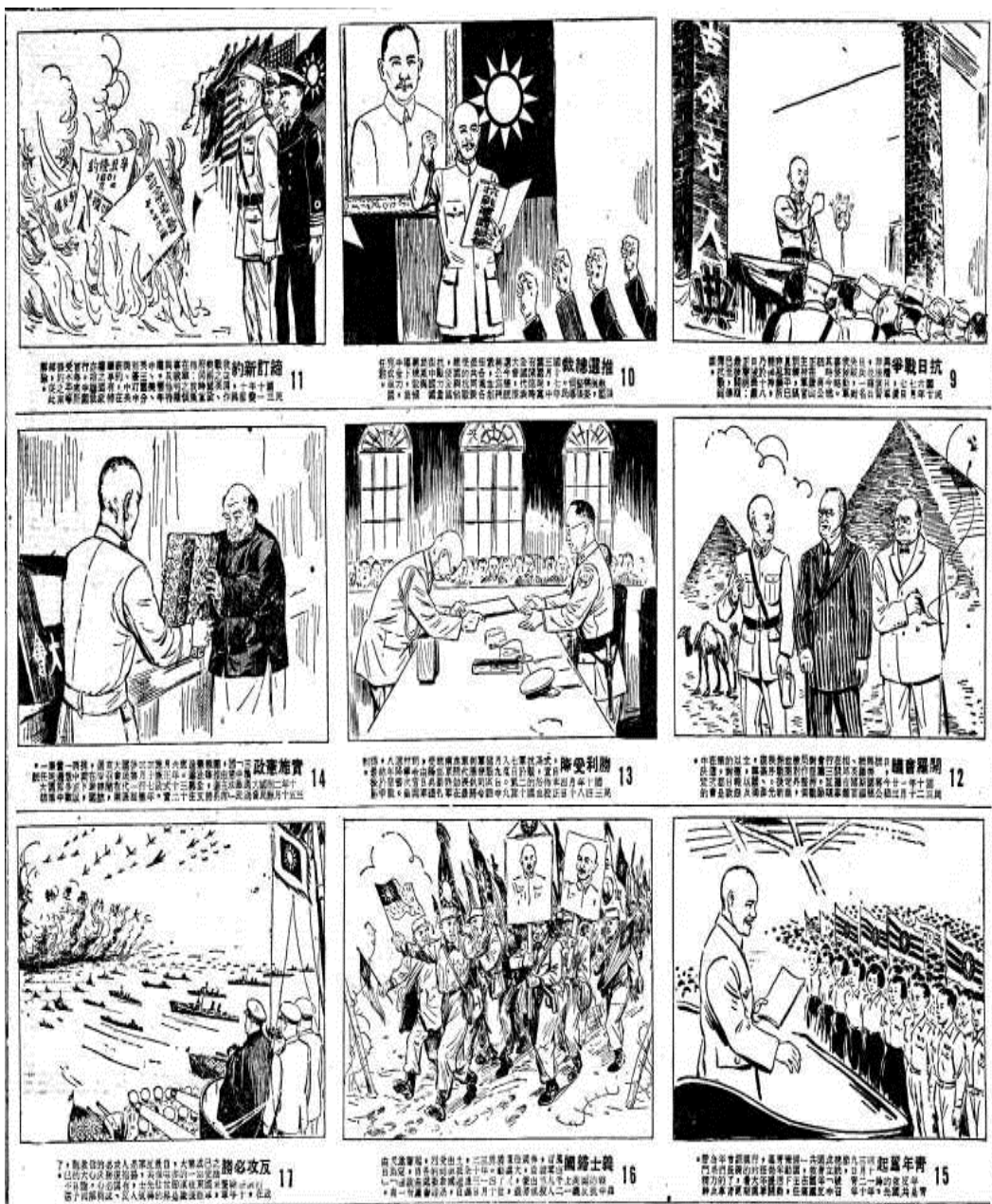


圖 2

資料來源：梁中銘繪，〈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史畫〉，《中央日報》，民國 50 年 10 月 10 日，版 10、11。

它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將之收編作建國前革命的一個階段。這種基本立場的差異，至今仍未改變。

二、黑暗「十一」與光輝「雙十」：正偽國慶的形塑

每年十月一日，匪偽政權在北平天安門城樓上，陳列魔鬼陣容，驅動全城民眾，總要展出一套火爆的場面，其中的最主要的節目，是標榜俄匪主奴不可分離的關係，歌頌主子的浩蕩恩德，加上在東歐一群傀儡的一唱百和，搖尾叩頭，充分表現幫兇的嘴臉和威風。⁸⁵

這是刊載於黨務刊物中一段對於中國十一國慶的描述，由於這同辛亥革命一樣攸關中國正統性的競爭，國民黨不只要防備共產黨爭奪辛亥革命詮釋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也要加以撻伐。

從黨務資料可見，當時國民黨為了防止十一國慶在臺灣內部流通，要求各地密切注意匪諜活動以書刊等形式的宣傳陰謀。⁸⁶ 防止之外，還要進一步將之扭曲。早期黨國媒體對十一國慶的報導，往往強調其場面之肅殺、冷清。但是往後在避免「為匪宣傳」的考量下，「十一國慶」一辭亦禁止在島內流通。根據 1955 年 9 月發布的〈宣傳通報〉，針對共產黨政權於 10 月 1 日慶祝「所謂『國慶』」，國民黨在宣傳上採取的方針大要如下：（一）當日報刊社論應對「共匪」作有系統的抨擊，各廣播電臺對此等社論應作介紹。唯文字中切勿提及「偽『國慶』」字樣，以免為其宣傳；（二）無論新聞來源，其中有「偽『國慶』」字樣皆應刪去。關於港、澳等地偽「國慶」日，僑胞對之漠視的新聞，在國內報紙不予報導，在海外各地報紙，應作簡單報導，另加強僑胞熱烈籌慶雙十節之報導，以轉移讀者視線；（三）各報刊應約請專家或社內人員，分別對共匪行徑作專題評述。此等評述由各電臺分別播出，插播總統歷年來關懷大陸同胞之訓示；（四）利用匪方資料，評述大陸同胞自發自動的反共運動，歸結到「從大陸內部反攻大陸」，「從敵人內部瓦解敵人」之必然性，而暗示此等運動，實源於我方號召，接受我方領導，以轉移世人對共匪統治堅

⁸⁵ 〈天安門的陰影〉，《時事週報》，第 1 卷第 3 期（民國 49 年 10 月 21 日），頁 8。

⁸⁶ 〈宣傳業務通訊〉，《宣傳週報》，第 7 期（民國 41 年 9 月 11 日），頁 7。

強不易進攻的錯誤觀念。⁸⁷

1956年《宣傳週報》亦如此指示：（一）自9月28日起至10月4日止，各報應對共黨罪行作有系統報導，以與自由中國農村的繁榮，工商業的活潑及經建的進步情形，作強烈對比，使讀者切實認識「大陸是地獄，臺灣是天堂」；（二）10月1日各報社論應對共匪罪行加以無情抨擊，各電臺應摘播各報特稿及社論，重複對大陸廣播。並插播總統歷年來對大陸同胞關懷訓詞；（三）新聞社論特稿中勿提偽「國慶」兩字，以免為匪宣傳。即使外電中內容對匪不利，亦應將兩字刪去；（四）關於港、澳等地偽「國慶」日，僑胞對之漠視的新聞，在國內報紙不予報導，在海外各地報紙，應作簡單報導，應加強僑胞熱烈籌慶雙十節之報導。⁸⁸

這些指示在1960年代以後港澳等海外地區的國慶報導中反映出來。過去媒體慣以報導海外僑民對國共雙方國慶態度的差異，突顯四海同心氣勢。1951年，相關報導香港僑民對十一國慶冷落態度時遣詞為「十月一日為中共所謂『國慶日』。」⁸⁹但往後十一國慶卻在媒體報導中消聲匿跡，有出現者亦直接用「偽慶」取代。⁹⁰1963年，媒體報導港澳在十月期間對中共政權冷漠時，只提到：「本月一日中共『慶祝那天』，只看得到寥寥可數的『五星旗』。」⁹¹在其他更多海外報導中，「偽慶」的使用在黨國媒體中普及、慣用，⁹²「五星旗」也被蔑為「汙腥旗」。

作為「偽慶」的對比，就是雙十國慶正統性的形塑。這個中國人真正的國慶不僅在自由祖國被慶祝，身陷大陸匪區的苦難同胞也透過各種方式共襄

⁸⁷ 〈一三九號〉，《宣傳週報》，第6卷第14期（民國44年9月30日），頁3。

⁸⁸ 〈對偽政權所謂「國慶」我宣傳上應採的對策〉，《宣傳週報》，第8卷第13期（民國45年9月28日），頁3。

⁸⁹ 〈港華僑明辨邪正 不理睬匪偽國慶〉，《中央日報》，民國40年10月2日，版2。

⁹⁰ 參考〈港澳僑胞慶祝國慶 今年盛況空前〉，《中央日報》，民國51年10月11日，版2。

⁹¹ 〈港澳一帶國旗蔽空 僑胞熱烈慶祝國慶 對匪偽政權又一次有力否定〉，《中央日報》，民國52年10月11日，版2。

⁹² 曾建，〈雙十國慶在港澳〉，《中央日報》，民國53年10月10日，版13；青聲，〈祖國，我們需要你！——記今年舊金山雙十國慶遊行盛況〉，《中央日報》，民國63年10月19日，版10；楊超寰：〈全球僑胞心向自由祖國 每逢國慶隆重熱烈慶與偽慶寂寥冷清形成強烈對比〉，《中央日報》，民國71年10月8日，版3。

盛舉。例如，1951 年報導國軍反共游擊隊在粵南山區秘密慶祝國慶，許多民眾在游擊隊保護下參加並慰勞。⁹³ 1956 年《宣傳週報》則刊登廣州市民於雙十節前抗暴，並向臺灣寄出標語，呼趕緊解救大陸同胞。⁹⁴ 1973 年報導參加國慶大會的反共義士們公開表示匪區有如墳場，來到臺灣才覺得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⁹⁵

這種報導的真實性如何，不無可疑之處，在此透過一些史料的比較來檢視。1962 年《時事週報》匪情報導，指同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副速寫畫〈寫出了六億人民的心願〉，內容是一個舞臺上正上演「毛主席萬歲」的街頭劇，這幅畫將舞臺畫得十分熱鬧，但臺下觀眾卻稀稀落落只有 9 個人，這些觀眾面部表情呆板沒有一人作鼓掌狀。該報導指稱由這幅畫可知大陸同胞對共匪醜劇的厭惡，是真正寫出了大陸人民的心情。⁹⁶ 然而參考圖 3，檢視當日的《人民日報》，這幅速寫畫並非主題「毛主席萬歲」街頭劇，而是數名工人在架設、裝飾「毛主席萬歲」的看板，而下方則有數名民眾看著這一國慶前的準備工作。⁹⁷

1975 年又有一報導指中國《中國對外貿易》季刊刊載一幅「乳燕迎春」蜀繡照片，圖中舞蹈的兒童兩名在前一名在後，前者姿態近似雙十字樣，後者則單成一「十字」，四周則有眾多兒童圍觀叫好，中立者所持的手風琴是中華民國國旗藍白紅三色構成。報導指這幅圖所迎的春正是雙十國慶，而在右上角那位獨自舞蹈者，報導則指這是成一「十字」，暗示冷清的「十一」偽慶，顯示中共對文藝界高壓措施的失效，共產暴政窮途末路。⁹⁸ 然而，參考圖 4 這三位舞蹈者的相對位置似乎也可以單純解讀為兩前一後的三人隊形，手持

⁹³ 〈游擊隊在粵南山區莊嚴紀念國慶〉，《中央日報》，民國 40 年 10 月 23 日，版 4。

⁹⁴ 〈聲援廣州人民反抗抗暴〉，《宣傳週報》，第 8 卷第 18 期（民國 45 年 11 月 2 日），頁 3-4。

⁹⁵ 〈臺灣朝氣蓬勃 匪區有如墳場 六反共青年欣喜返祖國懷抱 親見國慶況無限興奮〉，《中央日報》，民國 62 年 10 月 12 日，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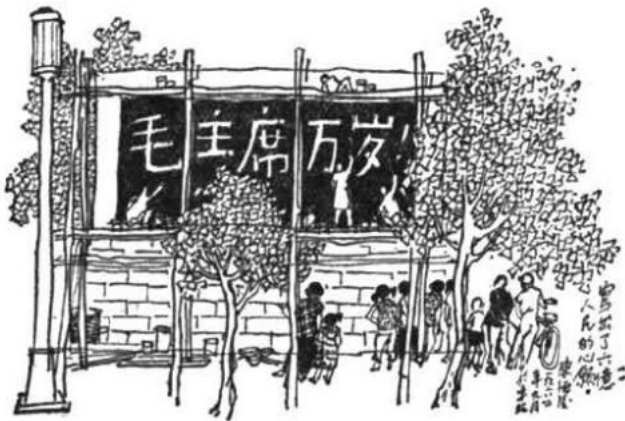
⁹⁶ 〈匪區一幅速寫油畫 寫出六億人民心願〉，《時事週報》，第 4 卷第 36 期（民國 51 年 12 月 7 日），頁 7。

⁹⁷ 〈國慶前夕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喜氣盈盈〉，《人民日報》，1962 年 9 月 29 日，版 3。

⁹⁸ 〈大陸人唾棄共匪又一明證 匪一外貿刊物登載 歌頌雙十國慶照片〉，《中央日報》，民國 64 年 12 月 10 日，版 3。

圖 3

資料來源：陳德陵繪，〈寫出了六億人民的心願〉，《人民日報》，1962年9月29日，版3。



写出了六亿人民的心愿（速写） 陈德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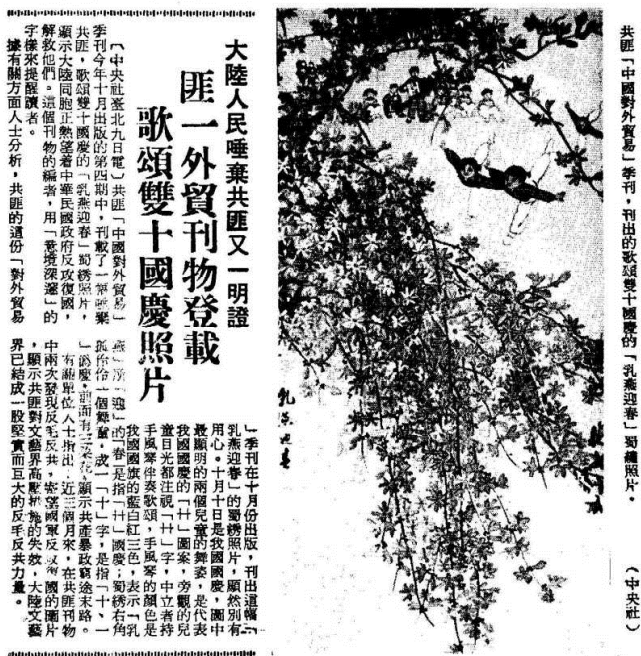


圖 4

資料來源：〈匪一外貿刊物登載 歌頌雙十國慶照片〉，《中央日報》，民國 64 年 12 月 10 日，版 3。

手風琴的中立者也只占了畫面的極小部分。吾人至少可以說，不管這些報導真假與否，都少不了黨官方一番帶有政治意圖的加油添醋。

在這種宣傳結構中，大陸群眾與共產政權是分開的，前者是中華民國的精神國民，他們在十一偽慶中虛應故事、對雙十國慶卻真心崇敬。黨國體制下對於自外部可能流入的資訊揀選、封鎖，將經過處理的資訊傳達給國內民眾，這些訊息主要供國內流通，在其他具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理當有機會獲得較臺灣島內更完整的訊息。因此，這些報導在鞏固內部統治正當性的意義仍然較大。

三、四海都有「中國人」：海外華僑認同的爭取與塑造

雙十國慶中每每可見華僑身影，大批華僑為此返國，媒體大舉報導海外華僑同步歡慶，國共雙方在華僑社群間的互相攻擊、爭取，亦為國慶日常見的新聞話題。其中，香港可以說是 1997 年主權回歸中國前，兩個政權競爭最激烈之處，臺灣媒體往往稱這天是旅港華僑民心向背的「測驗器」，⁹⁹ 或測定政治傾向的「晴雨表」¹⁰⁰。

根據社會學者蕭新煌和尹寶珊的研究，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並未被強迫施以具政治意義的英國認同，而香港本身雖然明顯成為主導性的本地化集體認同對象，但身為華人或中國人居住地的歷史背景，也始終是另一個在文化與族群上的集體認同對象。九七回歸前，香港認同與中國認同在政治意義上的差異並不強烈，且所謂的中國認同也不必然意味著一個政治實體，而是泛指文化和歷史的中國或華人。到了八〇年代中後期，當回歸不能避免，且「中國」明確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認同與中國認同在內涵產生質變的同時，彼此之間也出現取代性和矛盾性。¹⁰¹ 李拓梓也指出，1949 年後由

⁹⁹ 〈海外各地僑胞 盛大慶祝國慶 港九遍懸青天白日國旗〉，《中央日報》，民國 44 年 10 月 11 日，版 2。

¹⁰⁰ 〈港澳一帶國旗蔽空 僑胞熱烈慶祝國慶 對匪偽政權又一次有力否定〉，《中央日報》，民國 52 年 10 月 11 日，版 2。

¹⁰¹ 蕭新煌、尹寶珊，《臺灣與香港的集體認同：一九九七前的比較》（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3。

於大批難民從中國逃往香港，香港社會基於恐懼，對中華民國好感甚高，即便是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未影響香港民眾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不過，這種認同與其說是對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認同，不如說是「反共不反中」。¹⁰²雖然香港的中國認同並不明確指涉某一政治實體，但在國共隔海對抗最激烈的年代，香港也確實是兩方陣營短兵相接之處。對此，英國總督不執行任何明顯的偏袒或壓制，而是適當地管控這種節日集體行動，不使發生激烈衝突。然而，這些發生在香港華人社會間的政治鬥爭，工會組織、影視企業等機關團體鮮明的左、右翼旗幟，¹⁰³往往單純地被國民黨宣傳為「附匪」與「愛國」的對抗。以下將以香港為例，看黨國體制如何形塑海外「中國人」正確、應該的樣貌。

黨國媒體對香港地區報導，著重在當地華僑心向自由祖國，觀點單純地流於正義與邪惡的對照。1951年，國民黨一份海外刊物刊出與國慶日相關的文章，文中提到10月裡中國有兩件大事，一件是雙十國慶，是民族最光榮的一日；另一件是10月1日，匪偽政權成立的日子，是最恥辱的一天，然而匪幫卻稱之為國慶日，每逢此日就要來一套群魔亂舞、大排血腥的慶功宴。儘管全國同胞對匪幫言行充滿鄙夷憎恨，但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同胞，不僅喪失慶祝雙十的權利，更不得不在脅迫下慶祝10月1日偽國慶。甚至住在香港的僑胞，照理可以正常表現情緒，但由於共匪初期的狡獪宣傳和卑鄙伎倆，部分香港僑胞不得不在去年抱著應付態度掛掛五星旗，在10月10日真正國慶日那天只能按捺心裡熱情，佯若無事，噤若寒蟬。幸而最近一年來，在本黨澈底改造和政府勵精圖治之下，局勢已經扭轉。該文舉出數則香港當地報導，指出在香港慶祝十·一者，都是寥若晨星的親共團體，慶祝雙十節者則座無虛席。¹⁰⁴

早期國共鬥爭在港爆發流血衝突，最嚴重的是1956年雙十國慶的「九龍

¹⁰² 李拓梓，〈七十年代以來香港認同政治的變遷：一個臺灣的觀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頁32。

¹⁰³ 參考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5月），頁197-198。

¹⁰⁴ 〈由香港僑胞對今年真偽國慶日的表示說到本黨同志的應有警覺〉，《海外黨務通訊》，第1卷第12期（民國40年10月），頁2-4。

暴動」。由於李鄭屋徙置區和荃灣寶星紗廠員工宿舍裡的中華民國旗幟被撕，大規模破壞活動因而發生，學校和商店等遭到破壞搶劫，至 11 日，九龍半島上遭焚燒和洗劫的店家等達三百餘家，人員死傷逾三百人。13 日中國總理周恩來約見英國駐華代辦，指該事件乃由國民黨特務策劃，對香港當局未能有效制止提出抗議。當晚香港總督葛量洪開始採取行動，逮捕暴亂分子，但在相關談話中未提中國抗議事。周恩來 16 日再度抗議，港督則在當日下午的記者會上回駁，認為中方指責是干預內政，且暴動亦無充分證據顯示為國民黨策劃。香港當局於 1957 年 1 月為此事發表《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仍遭中國抗議掩蓋了事實真相。¹⁰⁵

國民黨《宣傳週報》對此以「九龍毀旗流血事件」稱之，指出：（一）僑胞絕大多數安分守己且忠貞愛國，尤其是滯港難民，絕少有違法亂紀情事，香港政府對此亦詳。港府對各國人民於國慶等節日懸掛國旗向來不予干涉，此次實因青天白日國旗被撕毀，才引起難胞出於義憤而發生糾紛；（二）強調此一事件之所以演為流血慘案，皆因共匪潛港搗亂，企圖嫁禍愛國同胞；（三）說明護旗糾紛與流血慘案雖然相關，然性質完全不同。護旗是愛國的人情之常，而流血慘案是匪共蓄意的破壞行動。盼港府對此事件作合理處置；（四）揭穿共匪一貫作風是「和平」與「戰爭」交互作用，共匪對香港的和平攻勢後就隱藏著戰爭威脅。希望香港當局提高警覺，¹⁰⁶ 並呼籲英國認清面目。¹⁰⁷

位於香港的另一個鮮明雙十國慶風景，為調景嶺旗海。「香港調景嶺營」是 1950 年 6 月為了安置中國大陸難民而設立，在臺灣「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援助下，漸成一個自治社區，中華民國國旗終日飄揚，宛如另一國度，也是中華民國海外的精神堡壘。¹⁰⁸ 1997 年以前每逢雙十國慶等重大節日，

¹⁰⁵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卷一—遠古至 1959 年）》（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7 年 8 月 2 版），頁 394-395。

¹⁰⁶ 〈香港九龍旗事件 言論報導慎重處理〉，《宣傳週報》，第 8 卷第 16 期（民國 45 年 10 月 19 日），頁 1。

¹⁰⁷ 〈九龍在押千餘僑胞 港政府應迅速審結〉，《宣傳週報》，第 8 卷第 25 期（民國 45 年 12 月 21 日），頁 3。

¹⁰⁸ 胡春惠，〈香港調景嶺營的出現與其在歷史上意義〉，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5 月），頁 533-545。

調景嶺皆掛旗慶祝，港方並不特別干涉。後因「九七回歸」在即以及香港當局的徒置計畫，終遭拆除。

在 1970 年代一連串的外交震撼後，從《中央日報》刊載的相關文章裡，可以看到「海外華僑認同自由祖國的意志仍然穩固」的氣氛營造。1973 年一位香港華人投書，分享在國慶前夕看到的熱鬧景象，當她向一位英國女性友人介紹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時，這位女性興奮地問：這是臺灣的國旗嗎？作者則嚴正糾正：「不，是中華民國，自由的臺灣。」¹⁰⁹ 另有一篇投書，談到自己遇到香港華僑，好奇詢問為何今年港澳地區來臺僑胞較往年為多？那位華僑則答以種種徵兆已顯示共匪即將垮臺，眾人是以行動表示愛國。¹¹⁰ 1984 年中國和英國達成香港歸還的協議，媒體呈現的亦是相同論調，指香港僑民面對九七大限的不安情勢，中共趁機利用十一偽慶進行統戰，但我華僑仍以擴大舉行雙十來抵制。¹¹¹

綜上所述，在黨國媒體宣傳下，香港華僑每每「都在極端的興奮中歡渡雙十佳節，其所表現是無比的熱烈，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真正的國慶。」¹¹² 以香港為指標，從他們慶祝國慶的盛況可知海外中國人民心向背，這是自由中國受到全球華人支持的最佳證明。

上述以香港為主的描述看似與臺灣無關，不過透過黨國媒體篩選、編輯過後的香港「實情」，並非只是報導新聞而已，也是一種尋求自由中國國內——即臺灣民眾對國民黨的政治支持。因為，如果連海外的「中國人」都如此支持「自由中國」，那麼國內的「中國人」應當更具信心。

有關「九七」以前香港華人的政治認同傾向，根據國史館在九七大限前後對原調景嶺居民所作的口述訪談，一位人士曾表示，每逢雙十國慶，雖然

¹⁰⁹ 金鋼，〈海外逢國慶〉，《中央日報》，民國 62 年 10 月 14 日，版 9。

¹¹⁰ 阜元，〈四海歸心慶國慶〉，《中央日報》，民國 65 年 10 月 10 日，版 12。

¹¹¹ 〈香港僑團會商決定 擴大雙十國慶活動 以示對自由祖國擁戴〉，《中央日報》，民國 73 年 9 月 24 日，版 2；〈港僑回國慶賀團一致表示 永遠和自由祖國站在一起〉，《中央日報》，民國 73 年 10 月 9 日，版 2；〈港九僑胞歡祝國慶 確切表明人心向背〉，《中央日報》，民國 73 年 10 月 11 日，版 2。

¹¹² 〈一個令人激動的日子 雙十節在香港〉，《中央日報》，民國 41 年 10 月 14 日，版 5。

香港不少地方皆掛中華民國國旗，但這主要是民間表達對中共不滿，未必等於對現今臺灣政府的嚮往。¹¹³ 李拓梓也指出，九七大限明確化以後，隨著中華民國漸漸失去影響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和平崛起及臺灣本土化聲浪的增加，由淡薄到衰微，到了香港九七回歸前途已定，中華民國在香港的影響力幾乎全潰，更遑論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的發展。一位香港民眾表示，在香港支持國民黨和中華民國者被稱作右派或親臺派，過去每逢雙十必定升旗聚餐。對於左派而言，國家是什麼他們從未疑惑，但臺灣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去中國化過程就令右派難以接受，對所支持的國家為何感到迷惘。¹¹⁴

伍、「動搖的雙十意象」解嚴以來國慶日的變貌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不同執政者任內國慶日皆有不同面貌，蔣中正時期軍事色彩鮮明，蔣經國時期在意識型態上沒有太大變動，不過呈現的形式卻較為和緩。1988 年李登輝繼任為總統後，隨著 1987 年解嚴以來的臺灣政治與社會之變遷，國慶逐漸擺脫過去不容挑戰的「反共復國」時代氛圍，在意識型態或呈現形式上都顯出遞漸式的改變。並且，國慶日這個舞臺也更為開放，反對運動時常藉國慶場合發動，和官方互爭媒體版面，這與過去執政者意志主導的節慶風景顯有不同。

首先，關於元首文告論述的轉變，九〇年代李登輝總統的發言大體上仍在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框架之下。在完成總統直選的憲政改革工程以前，諸如：「中國必將統一」、「中國人的命運是一體的」之類的發言，必定是國慶祝詞中最醒目的標題。¹¹⁵ 隨著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展開，文告中對於「經營臺灣」的強調亦有增加，例如 1992 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憲政改革起步時

¹¹³ 胡春惠主訪，《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 86 年 12 月），頁 169。

¹¹⁴ 李拓梓，〈七十年代以來香港認同政治的變遷：一個臺灣的觀點〉，頁 33-34。

¹¹⁵ 樊祥麟，〈李總統發表國慶祝詞正告世人 中國祇有一個 應當統一 也必將統一〉，《中央日報》，民國 79 年 10 月 10 日，版 1；〈李總統發表國慶祝詞 昭告海內外同胞 中國人的命運終為一體〉，《中央日報》，民國 80 年 10 月 10 日，版 1。

喊出：「要以新認識、新思想迎接新時代的來臨。」¹¹⁶ 1995 年國慶文告提出「經營大臺灣，復興新中國」口號，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已達成民主、均富的目標，而中國重歸統一的前提，就在於中共當局對自由民主體制的尊重。¹¹⁷

與此同時，國慶日也成為反對勢力衝撞既有體制的場合，節日慶典的集體參與形態發生質變。1991 年，言論自由運動人士以廢除刑法第一百條和在雙十節進行「反閱兵，廢惡法」活動為訴求而組成「一〇〇行動聯盟」，反制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的國慶閱兵，¹¹⁸ 該聯盟於國慶日在總統府附近進行徹夜的靜坐示威。這個行動是臺灣當代與未來的知識精英，第一次對象徵「中華民國」歷史正統性的最重要國家式典所做的正面抗議行動，¹¹⁹ 該年閱兵為區隔抗議群眾，首次在層層鐵絲網和憲警保護下進行而無法有過去萬民歡呼的場面，¹²⁰ 挑戰了國民黨所塑造的神聖性。由於 1996 年臺灣首次民選總統時，按往例本應舉行盛大閱兵，但該年度國防部是以預算不足，避免刺激中國，減少兩岸關係無謂猜測為由，取消國慶閱兵，¹²¹ 因此 1991 年的閱兵也成為九〇年代以來的絕響。

過去由三臺聯播的國慶晚會漸漸呈現本土意象，1995 年的國慶晚會以族群融合為主題，推出福佬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節目，¹²² 往後表演者也以臺灣本地藝人為主，和過去邀請香港藝人來臺表演，營造雙十國慶為四海中國人慶典的意象不同。¹²³ 然而，其凝聚社會集體感的角色亦被其他嶄新的集

¹¹⁶ 〈李總統的國慶大會致詞勉勵海內外同胞〉，《中央日報》，民國 81 年 10 月 11 日，版 1。

¹¹⁷ 王烱華，〈李總統國慶致詞期勉同胞 以捍衛中華民國為志業 經營大臺灣 復興新中國〉，《中央日報》，民國 84 年 10 月 11 日，版 1。

¹¹⁸ 張炎憲等訪問，〈陳師孟訪問記錄〉，收入張炎憲等編，《100 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臺北：國史館，2008 年 5 月），頁 22。

¹¹⁹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247。

¹²⁰ 張炎憲，〈狂飆年代的知識份子〉，收入張炎憲等編，《100 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頁 13。

¹²¹ 王烱華，〈今年國慶日 不舉行閱兵〉，《中央日報》，民國 85 年 8 月 5 日，版 4。

¹²² 楊希文，〈國慶晚會凸顯「族群融合、全民一心」主題〉，《中央日報》，民國 84 年 10 月 11 日，版 2。

¹²³ 董秀雯，〈國慶晚會 本土天后壓軸 不同以往全靠港星〉，《中央日報》，民國 87 年 10 月 3 日，版 18。

會型態取代。1994 年 12 月，首屆民選臺北市市長陳水扁於 12 月 25 日行憲紀念日前夜舉辦「阿扁和他的自助舞會」，1995 年 1 月 1 日開國紀念日前夜舉辦「市民之夜」跨年晚會，同年 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節「共鳴時刻——We Are Here」飆舞活動，這些以官方姿態選擇在國定節日策畫偏離國定節日原有紀念意涵的晚會活動，在當時可說相當少見。¹²⁴ 這些在戒嚴時期官方節日活動中難以想像的傳統顛覆，發生在首次由新興政黨執政的首都，顯得更引人注目，陳水扁也藉由這些開風氣之先的顛覆行動，打出與過去執政不同的新氣象，累積個人的聲望。

日後，此種由官方主導的嶄新型態狂歡活動，以跨年晚會的形式逐漸蔓延全臺，成為政治人物與群眾一種不同以往的互動方式，過去群眾大多被迫以強制動員，或是坐在電視機前毫無選擇只能觀賞三臺聯播的節日參與型式走入歷史，「一起去倒數跨年」豐富了臺灣群眾的元旦意象，跨年活動的「集客力」取代過去元旦或國慶的「動員力」，成為新時代中新集體記憶的一部分。¹²⁵ 2000 年當選總統的陳水扁更進一步將跨年晚會形式的節日活動帶到總統府，於該年歲末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迎接新世紀，來去總統府」活動，並有「民間大樂兵」（音諧：「閱兵」）夜間花車遊行，與民眾一起倒數。¹²⁶

2000 年民進黨主政的國慶大會改由北京、福佬、客家、原住民等語言朗讀的國慶禮讚、煙火表演和聯歡晚會移往臺北以外縣市施放、被評為「非閱兵的閱兵」國防表演、紀年捨民國用西元、或是陳水扁總統在國慶文告中多喊了一句「臺灣人民萬歲」，或是喊不喊「中華民國萬歲」及「三民主義萬歲」都會引發支持與反對勢力關注、論戰。¹²⁷ 上述現象反映出民進黨時期的國慶

¹²⁴ 廖漢騰，〈從開國紀念日到跨年狂歡——論新興的臺灣大眾文化國族主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7 月），頁 71。

¹²⁵ 廖漢騰，〈從開國紀念日到跨年狂歡——論新興的臺灣大眾文化國族主義〉，頁 100。

¹²⁶ 周美惠等，〈世紀交替 凱達格蘭越夜越瘋狂〉，《聯合報》，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版 3。

¹²⁷ 彭威品，〈政黨輪替首次國慶 陳總統致詞強調臺灣精神〉，《聯合報》，民國 89 年 10 月 10 日，版 1；彭威品，〈陳總統 重回九二精神 兩岸恢復對話〉，《聯合報》，民國 89 年 10 月 11 日，版 1；〈總統國慶祝詞：公投定新憲〉，《聯合報》，民國 92 年 10 月 11 日，版 A1；吳明杰，〈怪怪國慶 總統坐著接受軍禮〉，《中國時報》，民國 96 年 10 月 11 日，版 A6。

日可說是陷入「失序」的狀態，這同時意味社會共識規範的失序，與固有意識型態的失序。這種混亂中鮮明的新意象，就是內含國家認同意義的臺灣在官方經營下與中華民國認同的競爭。特別是民進黨在 2007 年時推動「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該次國慶總統府前大典或晚會高掛的不是熟悉的「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字樣，而是「臺灣加入聯合國」、「永遠的臺灣」等語，且陳水扁在致詞中提及「中華民國」者只有一處，即聲言：「如果再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要求重返聯合國，¹²⁸ 將重蹈『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覆轍」，在慶祝中華民國生日的場合強調以臺灣名義入聯重要性，彷彿為其國運敲下喪鐘。

在反對勢力的參與方面，民進黨執政期間泛藍勢力對出席國慶盛典態度消極，2006 年由於陳水扁及家族一連串貪瀆事件，更有「倒扁紅衫軍」在同年國慶日發動「天下圍攻」（音諧：「天下為公」）的大規模滋擾活動。當日數名政治人物於隊伍行進時搗亂，在總統致詞時叫囂、鬧場，造成外賓錯愕也引來國際媒體關注。國慶日中的官方活動史無前例地被為數可觀的反對群眾包圍，相較於九〇年代初反對運動只在場外屈為配角，形容 2006 年這場國慶大典是：「反對運動和官方同列主角而演出對手戲。」應不為過。陳水扁致詞中針對倒扁行動表示：「意見可以不同，但不能破壞團結。國家認同可以分歧，但國家不能分裂。」並揚言：「許多團體表明不願參加今年國慶大會，是民主自由具體呈現，至少我們不必像過去五十年，參加雙十國慶大會敢怒不敢言。現在臺灣已經從威權走向民主，任何強制動員或非自願的出席，都不應該繼續存在」、「現在這種形式的國慶慶祝大會，大家意見這麼多，參加得又這麼勉強，應立即檢討明年以後不再舉辦。」¹²⁹

隔年倒扁風潮趨於緩和後，陳水扁不但沒有取消國慶大會，反而又增加形式近乎校閱兵力的軍事展示動員，並名之為「國防表演」，取消踢正步或總

¹²⁸ 林淑玲，〈四海同心晚會 徹底「去中華民國化」〉，《中國時報》，民國 96 年 10 月 10 日，版 A4；吳明杰，〈怪怪國慶 總統坐著接受軍禮〉，《中國時報》，民國 96 年 10 月 11 日，版 A6；邱燕玲，〈國慶致詞 扁用臺灣取代中華民國〉，《自由時報》，2007 年 10 月 11 日。

¹²⁹ 林淑玲，〈外面圍攻 裡面鬧場 扁怒：國慶大會以後不再辦〉，《中國時報》，民國 95 年 10 月 11 日，版 A2；邱燕玲等，〈形式不合時宜 扁建議明年停辦國慶〉，《自由時報》，2006 年 10 月 11 日。

統不回軍禮以免予外界「閱兵」印象。唯仍有媒體指其是違反常理的「非閱兵的『閱兵』」。¹³⁰ 當日紅衫軍雖仍然小規模示威行動，但國慶大典仍算是平和落幕，而陳水扁又完成一項節日行事的顛覆了。

單從國慶大典是一個國家最高政治節日儀式的觀點而言，站在舞臺上的主持者在主觀上並不服膺中華民國國家認同，而向來以維護中華民國為是，在紅衫軍占有相當數量的泛藍政治人物及群眾，則選擇在這個象徵性高的場合中作亂鬧場，使得該年國慶彷彿一場角色錯置的鬧劇，也更鮮明地表現出九〇年代以來國慶意象的「失序」。

然而，國慶日仍然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丟棄的節日。由於 2001 年「週休二日制」開始實施，¹³¹ 許多國定節日如國父誕辰、逝世紀念日或革命先烈紀念日等在休假日數調整的考量下改為「只紀念不休假」，使得國慶日與和平紀念日成為僅存的政治性國定假日，¹³² 略去九〇年代後方因「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及日後修訂的「賠償條例」中規定休假的和平紀念日不談，¹³³ 國慶日可說是中華民國僅存的，且是歷史最久的國定假日。即使週休二日制推動，或是民進黨以臺灣主體意識推動如制定反侵略日、解嚴紀念日、臺灣聯合國日，或廢除蔣中正紀念日等國定節日的增刪，¹³⁴ 但只要繼續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執政，於法於理都必須維持、執行這個最重要的國家慶典。這說明了國慶日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政治象徵，兩者休戚與共，即使它實質上在九

¹³⁰ 吳明杰，〈怪怪國慶 總統坐著接受軍禮〉，《中國時報》，民國 96 年 10 月 11 日，版 A6。

¹³¹ 「修正『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條文」，總統令華總 1 義字第 8900177720 號，《總統府公報》，第 6349 號（民國 89 年 07 月 19 日），頁 11。

¹³² 「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五條條文」，內政部令臺（89）內民字第 8962562 號，《行政院公報》，第 7 卷第 2 期（民國 90 年 1 月 10 日），頁 76-77。

¹³³ 「茲修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第四條條文，公布之。」，總統令華總（1）義字第 8600052080 號，《總統府公報》，第 6139 號（民國 86 年 2 月 25 日），頁 1；「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名稱修正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並修正全文」，總統令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5261 號，《總統府公報》，第 6736 號（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頁 86-89。

¹³⁴ 「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條文」，參考內政部令臺內民字第 0960131407 號，《行政院公報》，第 13 卷第 168 期（民國 96 年 9 月 3 日），頁 27485-27486。

〇年代前黨國體制或九〇年代後臺灣化等長時間的歷史變遷中，已經發生莫大改變。

陸、結 語

國慶日作為中華民國歷史最長久的國定節日，名目上毫無變動，實質上則因政治體制或統治範圍的轉型遷移而歷經許多變化。民國初年政治雖然紛亂，但主要政治勢力仍然共同擁抱它，來表述自我的統治正當性。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後，在民國統治框架下，國慶名稱依舊保留，但節日的形式與內涵則據國民革命史觀，進行了一次詮釋與象徵的改造。1949 年以後，中共捨棄原有國號及象徵建立新中國，原為國慶日的 10 月 10 日，則去其冕而成為非國定節日的辛亥革命紀念，在共產主義歷史觀下，收編作近代中國的一個階段性革命。另一方面，雙十國慶則成為國民黨政權主導下中華民國國家體制與意識型態象徵之一環，攜至臺灣。

在戰後臺灣的時空情境下舉行的雙十國慶，無疑是一道特殊風景。二次大戰後，過去在體制定位與實質統治上皆為日本帝國周邊（殖民地）的臺灣，在新政權下其定位雖仍為周邊（島嶼省份），實質上則為主要統治基盤。戰前日本統治下，天長節及紀元節在臺灣等於是帝國時間在某一地的延長或複製，¹³⁵ 國民黨統治下的戰後臺灣，雙十國慶在概念上仍為中華民國時間象徵的延長或複製，實質上則是僅存、唯一的象徵了。在這個僅有的統治範圍中，為了對內外展示統治正當性，國民黨當然有必要在國慶舞臺中更加竭力演出。拜在臺統治安定之賜，國民黨較過去在中國大陸時期，更澈底、長期地占有雙十國慶的舞臺空間及話語權力。追溯歷史記憶的源頭，即使辛亥革命發生時臺灣並非中國領土，然而在反攻大陸遲未完成的情況下，中華民國與臺灣在實質上合而為一，國民黨的詮釋下「自由中國」、「四海歸心」等意象，也權宜性地成為與臺灣關係緊密的修辭。而這種想像、意識上「漢賊不兩立」的中國認同，不僅對內向島民灌輸，對外也在海外華人社會，和中國的十一

¹³⁵ 參考顏杏如，〈「帝国の時間」と植民地台湾——天長節と紀元節を例として——〉，《日本台湾學會報》，第 13 期（2011 年 5 月），頁 51-76。

國慶競爭正當性。

政治解嚴以後，伴隨著中華民國的民主化與臺灣化，節日名稱雖仍未改變，實質則逐漸產生變化。臺灣從過去的邊緣定位被拉到論述中心，在儀式演出的要素上，被認為具有代表臺灣性質者，亦漸多於中國意象。九〇年代以來執政者在建國大典上的「反傳統」，甚至是顛覆，以民進黨執政時期最明顯，甚至在執政末期的慶典上宣示臺灣正名。另一方面，反對勢力亦瞄準國慶進行數度示威，尤其民進黨執政時期「倒扁紅衫軍」的行動，更造成現有國家認同的支持與反對雙方在演出上立場互異的特殊景象。

由於國際生存空間限制和臺灣主體意識高揚，中華民國在相當比例人民的心目中，未必是一個令人感到榮耀的名詞，國慶大典也未必被視作一個可以高度凝聚國民認同的神聖場域，不過，國慶日作為臺灣現有政治節日中最重要者，它仍然會一個引人注目的競演舞臺。

徵引書目

中日文部分：

一、檔案、史料彙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68/80，〈國慶紀念案〉。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01051616005，〈紀念節日案（二）〉。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年十月〉，文物圖書一稿本（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譯組編，《辛亥革命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二、年鑑、辭典

徐友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
2版。

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卷一—遠古至1959年）》。香港：中華書局，1997-1998年。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行政院新聞局編，《陳總統水扁先生九十年言論選集（上）》。臺北：編者，
民國91年5月。

易國幹等編，《黎副總統政書》。臺北：文星書店，民國51年6月重刊。

胡春惠主訪，《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86年12月。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民國78年11月。

張炎憲等編，《100 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臺北：國史館，2008年5月。
盛竹如，《螢光幕前——盛竹如回憶錄》。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

四、期刊、報紙

《人民日報》，北京，1962年、1981年。
《大公報》，天津，民國元年。
《中央日報》，上海，民國17年；南京，民國18-26年；長沙，民國27年；
重慶，民國27-34年；南京，民國34-38年；臺北，民國38-87年。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95-96年。
《民立報》，上海，民國元年。
《民進報周刊（革新版）》，臺北，民國77年。
《申報》，上海，民國元年。
《自由時報》，臺北，民國95-96年。
《宣傳週報》，臺北，民國41-45年。
《政府公報》，北京，民國元年。
《時事週報》，臺北，民國50-57年。
《海外黨務通訊》，臺北，民國40年。
《國民政府公報》，南京，民國36年。
《國聞週報》，天津，民國18年。
《教育雜誌》，上海，民國元年。
《順天時報》，北京，民國元年。
《新臺灣新聞周刊》，臺北，民國96年。
《臺灣新生報》，臺北，民國35年。
《聯合報》，臺北，民國65-92年。
《臨時政府公報》，南京，民國元年。

五、專書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

- 代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年3月。
- 不著撰人，《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六十一年國慶大會大會遊行手冊》。出版地
不詳：出版者不詳，民國61年10月。
- 中國國民黨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暨職工會宣傳科編，《國慶紀念特刊》。
出版地不詳：編者，民國29年10月。
-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5
月。
- 吳濁流，《無花果——臺灣七十年代的回想》。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年3
月。
- 王育德著，吳瑞雲譯，《王育德自傳——出生至二二八後脫出臺灣》。臺北：
前衛出版社，2002年7月。
- 李錦容，《臺灣女英雄陳翠玉》。臺北：前衛出版社，2003年3月。
- 政事堂禮制館編，《忠烈祠祭禮》。北平：編者，民國4年。
-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5月。
-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
司，2004年3月2版。
- 蕭新煌、尹寶珊，《臺灣與香港的集體認同：一九九七前的比較》。香港：
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8年6月。
-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完整版）》。臺北：前衛出版社，
2002年2月。

六、單篇論文

- 丸田孝志，〈抗日戦争期・内戦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象徴 国旗
と指導者像〉，《アジア研究》，第50卷第3号（2004年7月）。
- 丸田孝志，〈時と権力——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記念日活動と新暦・農曆の
時間（I）、（II）〉，《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10、11号（2005年3
月、9月）。
- 小野寺史郎，〈民国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国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る〉，《中
国——社会と文化》，第20号（2005年6月）。
- 林柏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國慶閱兵的政治意義——民國三十八年到

- 五十三年（1949-1964）》，《史學彙刊》，第 23 期（2009 年 6 月）。
- 何淑宜，〈評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近代中國》，第 147 期（民國 91 年 2 月）。
- 何卓恩、周游，〈「共和」與「革命」：民初「雙十節」詮釋之演變〉，《社會科學研究》，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155-160。
- 李學智，〈政治節日與節日政治——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國慶活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2006 年）。
- 姜瑞學，〈北洋政府與中華民國國民塑造——以「雙十節」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 胡春惠，〈香港調景嶺營的出現與其在歷史上意義〉，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89 年 5 月）。
-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民國 90 年 12 月）。
- 陳順孝，〈臺灣報紙版面政治學初探——1945-2004 重大事件的新聞建構〉，《臺灣史料研究》，第 24 號（2005 年 3 月）。
- 顏杏如，〈「帝国の時間」と植民地台湾——天長節と紀元節を例として——〉，《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3 期（2011 年 5 月）。

七、學位論文

- 李拓梓，〈七十年代以來香港認同政治的變遷：一個臺灣的觀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 石世華，〈雙十節總統府建築物裝飾涵意演變（1950-200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2008 年。
-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 紀慧君，〈我國元首論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年到八十三年元旦文告之語藝分析〉。臺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83 年 7 月。

蘇芳湄，〈臺北總統府廣場雙十節活動形式意涵演變（1950-2008）〉。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2008 年。

廖漢騰，〈從開國紀念日到跨年狂歡——論新興的臺灣大眾文化國族主義〉。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英文部分：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